

商前期青銅盤研究^{*}

蘇榮譽^{**}

提 要

青銅盤是長期被學術界忽視的類別，早於安陽的商前期青銅盤更缺乏關注，本文即是對出土和傳世的 27 件商前期青銅盤的研究。首先根據可靠的出土樣本，確定早商階段，即青銅盤的開始階段的風格面貌：盤腹外壁或光素、或飾弦紋、或飾帶狀紋飾，圈足或素面、或飾弦紋。然後明確殷墟早期的青銅盤的風格面貌：盤腹外壁和圈足飾紋帶、內壁滿紋飾、但皆平鋪類型，可由之框定商代青銅盤的風格趨勢是紋飾的繁複化。據此，有 20 件盤可推斷屬於中商階段，並發現裝飾盤內壁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徵，從圓渦紋到圓渦紋配魚紋、龜紋配魚紋，且魚紋有 3 條、6 條乃至其間再配鳥紋的演變過程。

由風格分析所建立的序列，首先說明因洹北商城的發掘而劃分出中商時期不僅合理，而且必要；其次對既往憑個人感覺或基於器物部分特徵而判斷青銅器年代的做法提出質疑；第三，對盤的技術分析可知，雖然器形和裝飾都較為簡單，但工藝總是大同小異，即使是同時代、同類型的盤亦如此，說明鑄工既有因時制宜、不想諸器同一的意願，也說明諸種地方鑄器的說法過於簡單化甚至屬於臆測。第四，紋飾的分析也揭示在一定時段，某些器形對應於特定的裝飾紋樣，圓渦紋和龜紋具有某種互換性，而圓渦紋應與水有關，不應稱為火紋。此外，在對具體器物的討論中，青銅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也有所涉及。

關鍵詞：商代青銅器、青銅盤、早商、中商、晚商、紋樣、鑄造工藝、鑄地

* 收稿日期：2022 年 4 月 18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 年 7 月 29 日

**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早期中原青銅器以其別開生面的造型和裝飾、獨特而精湛的工藝、特殊的功能和社會角色而著稱於人類早期藝術之林，諸多因素使中原青銅器雖然出現時間相對較晚卻可以後來居上。如何認識早期中原的青銅藝術和技術發展，一方面需要考古調查發掘的推進和精細化，另一方面也需要認真分析業已獲取的材料，推進研究。

中原青銅器濫觴於二里頭文化中期、發展於二里頭晚期，勃興於商代早期，經中商階段的過渡，在晚商殷墟階段呈現出鼎盛繁榮的格局。總體而言，青銅器類別的不斷增加、數量的持續增多、體量的階段性躍升，是和其紋飾與附飾的不斷繁複、工藝技術的持續精進密切相關的。但一些造型相對簡單的器物，因技術因素並不突出，卻可凸顯藝術的變化。本文將殷墟劃為商後期，殷墟之前為商前期，包含了商早期和商中期，以這一階段的青銅盤為例，分析它們的結構和紋飾，佐以鑄造因素的討論，參照學界的各種意見，重新認識這類器物在商前期的演變，以期使青銅器的斷代和產地問題的討論和說法步入更加理性和科學的軌道。

盤作為一種淺腹圓形容器，是古今慣用的日常器具。新石器時代的陶盤，大小不等，有平底直壁和弧形壁的區別，而以襄汾陶寺文化墓葬出土的內壁彩繪龍紋彩陶盤最精緻，其功能已非實用而成為禮器或葬器。¹

進入青銅時代，青銅是具有時代特徵的標誌性材料。屬於青銅時代早期的二里頭文化尚未見青銅盤，繼之的早商時期，考古學劃分為二里崗下層和上層，每層分前後兩段，屬於二里崗下層的青銅盤迄今也未發現，但屬於上層的青銅盤，在鄭州商城和黃陂盤龍城均有出土，各有兩件。但有商一代，青銅盤數量相對較少，以至於討論青銅器分期和時代特徵中，盤往往被忽視，對其研究頗為薄弱。²目前見到對商代青銅盤的專題研究出自難波純子，在她9頁篇幅的論文中（其中3頁為線圖），針對整個商代青銅盤，以林巳奈夫（1925-2006）的分類方法為基礎，

1 蘇榮譽，〈晉南出土春秋中期前青銅盤探論〉，收入山西考古研究院等編，《於沃集：曲村——天馬遺址發現60周年暨晉侯墓地發掘30周年紀念文集》（太原：三晉出版社，2022），頁16-65。

2 如楊錫璋、楊錫璋與楊寶成、鄭振香和陳志達的分期研究，參見楊錫璋，〈殷墟青銅容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頁48-55；楊錫璋、楊寶成，〈殷代青銅禮器的分期與組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79-102；鄭振香、陳志達，〈殷墟青銅器的分期與年代〉，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7-77。研究的綜述參見張婷、劉斌，《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盤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1-10。

簡明地將它們劃分為王都製造器和地方出土器，分別討論它們的演變，並根據同出器物判斷盤的用途，然後討論盤的紋飾及其變化。³或許是篇幅所限，結論性較多但論證相對不夠充分，而林巳奈夫的方法和體系的局限性則很明顯，將在下文具體討論。

商前期青銅盤，出土於大型遺址及其墓葬者，由於考古背景較為紮實，屬性與年代相對易於確定，但出土於中型墓葬或窖藏者，其年代和屬性較為複雜，歧見頗多；而對傳世品的意見更加分歧。本文試圖依據對商前期和殷墟早期較可靠青銅盤的風格、工藝分析，在獲得可信認識的基礎上，對不夠確定的盤進行討論。並在此基礎上，對其時代、風格和工藝特徵略作歸納，對相關問題略作申論。

一、鄭州商城青銅盤

鄭州商城出土的兩件青銅盤，分別出自白家莊墓葬和向陽回民食品廠窖藏。白家莊位於鄭州商城東牆外北段，村西緊靠一座長 150、高 7、寬 4-17 公尺的南北向土崗。1955 年農民在土崗下挖沙發現青銅器，隨即考古清理出 4 座墓。其中二號墓已殘缺小半，墓中出土銅器、玉器和陶片。5 件青銅器都是容器，包括一件盤。

盤 C8M2:3 口不平齊（圖 1.1，以下簡稱白家莊盤），沿向外弧折，顯得口更敞，薄唇，通高 105、口徑 295、圈足徑 175 公釐。底近平，腹壁外飾一周紋帶，紋帶平鋪貼敷在腹面，上下以細突弦紋為邊欄。圈足較矮、壁外斜，頂部一周均佈 3 個十字形透孔，一條突弦紋穿連其中。

3 難波純子，〈商代銅盤內底上的世界〉，收入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659-667。林巳奈夫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工作，系統地匯集在三卷本《殷周青銅器綜覽》（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1986）中，第一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和《殷周時代青銅器紋飾之研究》均涉及到盤（第三卷《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之研究》除外），第一卷第一編總論第三章「青銅器種類的命名」的第三節「盥洗器」首列盤，有九例；第二編「殷—春秋早期的青銅器」第一章「器形的時代演變」的第三節「各器各型之形制的時代演變」中，有一小節討論盤，分盤為「標準型」和「口沿寬平、足高」的 II 型，共列盤 96 件。筆者所閱讀和參考為廣瀨熏雄、近藤晴香翻譯之漢譯本。漢譯本的卷均有單獨一冊圖錄。本文所參考的主要是第一卷，見林巳奈夫撰，廣瀨熏雄、近藤晴香譯，《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102-104、241-242；第一卷圖片，頁 357-370。林氏長於將古典文獻和神話與古代器物的造型與紋飾聯繫起來，不乏附會之說；對青銅器的研究路徑，則是金石學與京都梅原末治（1893-1983）方法的結合，較為陳舊且有輕斷，如將清澗解家溝盤定為殷後期、白鶴美術館藏鳥飾盤為西周 II 期，實際應分別為商中期和殷墟早期。本文第五節另有簡要討論。

對於腹部的紋飾，發掘簡報和報告、郭寶鈞（1893-1971）及《中國青銅器全集》都以爲是夔紋，⁴只有馬承源（1927-2004）認爲是斜角目紋（圖 1.2）。⁵分析紋飾，明顯具有軸對稱性，並彼此勾連形成二方連續，線條寬度相對均一。紋飾的核心是眼睛，長圓形眼珠突出紋帶表面，上下眼皮對稱，上眼皮向左，並勾出和歧出雲形線，下眼皮向右出同樣的紋線，並與右側單元勾連起來（圖 1.3）。這一基本單元的重複形成紋帶，但並不見母題，似乎是純粹的裝飾。

關於這件盤的鑄造工藝未見分析，據照片，圈足十字形透孔形狀不規矩，其上面的腹壁紋帶上沒有鑄造披縫痕跡。紋帶拓片上有清晰的鑄造披縫縱貫斜角目紋的眼目（見圖 1.2），說明分型面在兩透孔之間，鑄型由三塊腹範、一塊圈足芯、一塊腹芯組成。

對於白家莊墓 C8M2:3，發掘簡報認爲墓葬年代屬二里崗時期；安金槐（1921-2001）曾判斷爲二里崗上層二期，但最後在鄭州商城發掘報告將其定爲二里崗上層一期，⁶張文軍等認爲屬二里崗上層一期偏晚階段，楊育彬和曾曉敏以爲屬白家莊期。⁷但限於材料和時代，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普遍認爲二里頭文化爲早商，二里崗文化屬於商中期，二里崗之後還有一個白家莊期，故張長壽、郭寶鈞、鄭振香和陳志達、楊錫璋和楊寶成都將白家莊 M2 歸爲商中期器。⁸過去將白家莊析出一個

4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第 10 期，頁 24-42，插圖 2，圖版 1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市博物館，〈鄭州新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文物》，1983 年第 3 期，頁 49-59，圖 17.3、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9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822，圖 554.1-3，圖版 231.1-2，彩版 38.1；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 5；中國青銅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圖 166。報告稱盤平底。

5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收入氏著，《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355-395；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小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No. 707。

6 安金槐，〈對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青銅容器分期問題的初步探討〉，《中原文物》，1992 年第 3 期，頁 7-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9 年考古發掘報告〉，頁 573-574、581-583。

7 張文軍、張玉石、方燕明，〈關於鄭州商城的考古學年代及若干問題〉，收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鄭州商城的考古新發現與研究 1985-1992》（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頁 30-47；楊育彬、曾曉敏，〈鄭州商城的考古學研究〉，收入楊育彬、孫廣清，《河南考古探索》（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頁 232-291。楊育彬、曾曉敏一文原名〈夏商周斷代工程·商前早期年代學研究課題·鄭州商城專題結題報告〉。

8 張長壽，〈殷商時代的青銅容器〉，《考古學報》，1979 年第 3 期，頁 271-300；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頁 4-5；鄭振香、陳志達，〈殷墟青銅器的分期與年代〉，頁 27-77；楊錫璋、

階段，很大因素是青銅器較為發達，此後隨著鄭州商城窖藏坑的發現，所出青銅器不少與白家莊的一致，所以鄭州商城考古發掘報告確定其為二里崗上層一期。

向陽回民食品廠位於鄭州商城東南角外 50 餘公尺處。1982 年夏在基建中發現了 7 件青銅器，遂進行清理發掘，確認屬於一個二里崗上層窖藏。窖藏中出土的一件青銅盤 XSH1:7（以下簡稱商城窖藏盤），出土時腹壁殘缺約三分之一，體形頗為碩大，通高 127、口徑 490、壁厚 2 公釐，殘重 7500 公克。底微圓，圈足壁外斜，其上段均佈三個不規則透孔，口沿外加厚呈弧形寬唇，圈足下段同樣加厚以強化本身（圖 2），設計頗為合理，但光素無紋飾。經洛陽銅加工廠分析，盤含銅 86.37%、錫 10.91%、鉛 0.69、銻 0.01%。鄭州工學院的金相分析，結果是 α 固溶體，有粗大的樹枝晶偏析。⁹ 雖然金相分析確認這件盤屬於鑄造成形，但具體的工藝迄今不詳。

對該窖藏的年代，鄭州商城發掘報告定為二里崗上層一期，楊育彬持有相同的看法。¹⁰ 鄭振香和陳志達認為接近二里崗上層。¹¹

二、黃陂盤龍城青銅盤

黃陂盤龍城是商代早期在長江流域的重要遺存，發現有多座城址、墓地和手工業作坊遺跡。出土的早商青銅器數量多，內含豐富，兩件青銅盤分別出自李家嘴兩座墓葬。

LZM2 是一座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坐落在李家嘴臺地中部南側，方向 20°，墓口已遭破壞，口小於底，基底 3.77×3.40 公尺、距地表深 1.41 公尺。葬具包括棺槨，槨 2.78×2.02×0.65 公尺，四周填白膏泥，槨板多雕刻獸面紋和雲雷紋圖案，有的塗朱；棺置槨室中間，尺寸 2.06×1.03 公尺。棺槨中間隨葬有漆木器，棺底

楊寶成，〈殷代青銅禮器的分期與組合〉，頁 79-102。

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市博物館，〈鄭州新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頁 49-59，圖 30。簡報和其他文獻均未說明洛陽銅加工廠成分分析的方法，若含錫量 10.91%，金相必然為 $\alpha + (\alpha + \delta)$ ，不可能如金相分析結果為 α 固溶體，顯然有偏差。參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9 年考古發掘報告〉，頁 822，圖 554.1，圖版 231.1。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9 年考古發掘報告〉，頁 5161-519；楊育彬、曾曉敏，〈夏商周斷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學研究課題·鄭州商城專題結題報告〉，頁 232-291。

11 鄭振香、陳志達，〈殷墟青銅器的分期與年代〉，頁 27-77。

有長方形腰坑。三個殉人分別置於槨室和槨板上。墓中隨葬銅、陶、玉和木器 77 件，其中青銅器 50 件，酒器多置於棺槨之間，尊、飲器和兵器置內外槨之間，玉器多在棺內和棺槨之間。該墓是迄今所知商早期最大的奢華墓葬，考古報告將其排在盤龍城第四期。

隨葬的一件青銅盤 LZM2:1（以下簡稱李家嘴墓二盤），口靠外槨西壁北端側置，與青銅簋 LZM2:2 為鄰。盤敞口，寬斜折沿，甚薄，通高 124、口徑 264 公釐。¹² 腹部紋帶的紋線寬而流暢。底微圓，圈足較高，一周均佈 3 個十字形大透孔，一突弦紋串聯其中，另一突弦紋切於透孔下邊。

腹部紋帶由 3 組紋飾組成，長度恰與圈足透孔之間相應。每組紋飾的中心有一道長條形窄脊稜，紋飾以之為對稱展開。其主體位於中間，是早期獸面紋，即除大鼻頭、臣字形眼和其中圓突的眼珠外，其餘均不可指認，但以勾雲線向兩側展開（圖 3.1）；兩端頭的紋飾僅一隻眼睛可辨識，其中突出長圓形眼珠，與相鄰一組紋飾的端頭構成對稱關係，倒置後近於獸面紋，但與居中的尚有出入，是否屬於另一種獸面紋，有待研究。

腹部紋帶萬家保（1926-2009）認為屬於範作紋，¹³ 即直接在鑄範上刻紋鑄造，恐難採信。從安陽出土鑄範看，還應屬模作紋，即紋飾做在模上，範從模上翻得。圈足透孔與腹部紋帶的紋飾組界位置相應，正是腹部披縫位置所在，且在口沿下披縫痕跡明顯（圖 3.2），說明此盤的鑄型由 3 塊範與一塊腹芯、一塊圈足芯組成。胡家喜等指出此盤圈足底面內斜，澆道和冒口處較厚，澆道尺寸為 95×3.8-74×3 公釐。¹⁴ 圈足的透孔外小內大，是圈足芯自帶泥芯撐成形，泥芯撐與腹範在器表結合。X 光片顯示底部有 2 枚墊片（灰色）和些許氣孔（黑點），氣孔集中處有一形狀不規則的白色斑塊，周圍有明顯縫隙（圖 3.3），當是原設墊片脫落後經修補的痕跡。

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152-157、175-176，圖 100、116.3-4，圖版 49.4，彩版 17.2；蘇榮譽、張昌平，《黃陂盤龍城青銅容器工藝研究》，待刊。

13 萬家保，〈安陽及黃陂兩商代遺址銅器紋飾之比較〉，《中國藝術史集刊》，第七輯（1977），頁 14。

14 胡家喜等，〈盤龍城遺址青銅器鑄造工藝探討〉，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附錄七，頁 582、588、590。

LZM1 坐落在李家嘴臺地頂端中部偏南，被農民發現後經考古清理，墓葬結構不清，葬式、葬具不明，器物已被擾亂，收集到的陶器 7 件、玉器 6 件、青銅器 22 件，其中包括一件青銅盤。該墓被劃歸為盤龍城第五期。

盤 LZM1:6 出土時碎裂嚴重（以下簡稱李家嘴墓一盤），修復後通高 120、口徑 276 公釐。¹⁵ 盤斜折沿，薄唇。腹略深，外壁飾三周突弦紋；圈足壁外斜，上端均佈三個十字形大透孔，孔下足壁加厚（圖 4.1）。腹部三條披縫在凸弦紋上和腹部與圈足過渡處明顯（圖 4.2），但透孔位置不在分型面上。盤底面均佈三個長方形塊，邊界清晰（圖 4.3），胡家喜等稱之為「銅芯撐」，測量尺寸為 22×12 公釐；在底外面與三個補塊相應的是不規則形狀的大補塊，突起於底外面約 2 公釐（圖 4.4），胡家喜等稱其為「補鑄芯撐」。¹⁶ 金相分析表明，其組織為 $\alpha + (\alpha + \sigma)$ 樹枝晶，鉛顆粒很少，有很少量的硫化物夾雜。¹⁷

底部三長方孔形既規則，分佈對稱，顯然不是澆不足孔洞或者氣孔，外底的補鑄亦較為講究。底部的 X 光片顯示出補塊與盤底清晰的邊界，說明底部別無墊片設置，若補塊是三枚墊片脫落的補鑄，三枚全部脫落、而且在鑄後不久脫落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參照盤龍城出土的鼎，在發明墊片之前，曾經以泥芯自帶芯頭（撐）的方式定位，保證型腔間距。這三個規則的長方形塊，正是腹芯自帶泥芯形成的芯撐孔，澆注後脫去泥芯，露出三個長方形孔，然後從圈足內逐一補鑄成器。

與李家嘴墓二盤相較，李家嘴墓一盤不僅腹壁未飾紋帶，底部也沒有放置墊片，而是採用泥芯撐、再補鑄芯撐孔的方式，裝飾和鑄造工藝都相對原始。發掘報告認為 LZM2 屬盤龍城第四期，LZM1 屬第五期，就兩件盤來看，後者顯早，或者說明略晚的墓葬隨葬較早的器物，或者說明二者年代十分接近。

上述四件盤，鄭州商城和黃陂盤龍城各出土兩件，恰巧都是一隻素面、另一隻具有帶狀寬線紋飾，雖然紋飾構圖不同，但紋線和風格一致，反映了兩地青銅

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頁 181、199，圖 116、138.5，圖版 49.4、60.3，彩版 17.2；蘇榮譽、張昌平，《黃陂盤龍城青銅容器工藝研究》，待刊。

16 胡家喜等，〈盤龍城遺址青銅器鑄造工藝探討〉，頁 595。

17 郝欣、孫淑雲，〈盤龍城商代青銅器的檢驗與初步研究〉，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附錄一，頁 517-538。

器的同步性和時代的一致性；二者的出入雖然細微，盤龍城兩盤都是斜折沿，而鄭州商城一弧沿另一尖沿，圈足下段壁厚均加大，尖沿盤口外也加厚，結構上更堅固合理，襯托出盤龍城青銅盤年代略早的氣息。這四件器應該能反映了商代早期青銅盤的基本格局，敞口、淺腹，腹外或素面或者飾一周寬線紋帶，圈足素面或飾突弦紋，上半均佈三透孔，多呈十字形。

三、平谷劉家河與安陽小屯 M232 青銅盤

1977 年，農民因取土在北京平谷劉家河發現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銅、金、玉、陶器 40 餘件，青銅禮器多達 16 件，其中包括兩件青銅盤，分別隨葬在墓槨室的東南角和西南角。

一件青銅盤出土時有一件青銅盃置於盤中，盤通高 95、口徑 255 公釐（圖 5，簡稱劉家河盤一）。此盤窄沿外折，腹壁弧鼓，外壁飾突弦紋兩周，內壁飾 3 組魚紋；內底面飾陰線圓渦紋，其外環一周圓圈紋鑲邊。盤的殘片曾經簡單的化學定性分析，表明含有錫和鉛，另有少量銻；鑄造工藝資訊未見披露。簡報稱盤內壁飾鳥首魚尾紋，未必允當。¹⁸ 李先登認為此盤年代較晚，約為殷墟一期。¹⁹ 陳旭說此盤形制與二里崗下層相當或偏晚，但未具體展開討論。²⁰ 殷璋璋和曹淑琴指出此盤與小屯 M232 中出土的盤相同，屬於殷墟一期；孟憲武也持相同的看法。²¹

青銅器的圓渦紋定名出自容庚（1894-1983），圓圈內「有曲線五若微渦之激起」，²² 但沒有涉及中心的小圓圈。馬承源稱其為「火紋」，為太陽標誌，其「特徵是圓形，中間略微凸起，沿邊有 4 到 8 道旋轉的弧線，表示光炎的流動」。馬氏

18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文物》，1977 年第 11 期，頁 1-8，圖 5、8、9。

19 李先登，〈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發現的主要意義〉，《考古學研究》（六）（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162-172；李先登，〈平谷上古文化與華夏文明〉，收入王宇信等編，《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95-97。

20 陳旭，〈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銅器墓的年代〉，收入王宇信等編，《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214-217。

21 殷璋璋、曹淑琴，〈平谷劉家河出土銅器墓及相關問題〉，收入王宇信等編，《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218-222；孟憲武，〈平谷商代青銅器與中原青銅器對比研究〉，收入王宇信等編，《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227-232。

22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41），頁 121。

進而指出二里頭文化已發現單個的火紋，只有圓形而沒有旋轉的弧線，²³ 似過於泛化。但確如他們指出，二里崗期青銅罍、爵的柱帽，常有這類紋飾。鄭州向陽回民食品廠窖藏出土的一件中柱盃 XSH1:6，盆形腹中央豎立一圓柱，傘狀柱帽表面飾圓渦紋。²⁴ 難波純子率先發現中柱盃渦紋與盤底所飾渦紋的關係，²⁵ 但並未將其敏銳的感覺深化。事實上，因柱帽較大，若將其紋飾落到底中心，外周以圓圈紋鑲邊，則和這件盤底紋飾一致。該紋飾與盤內壁魚紋搭配，此後可見被龜紋替換，說明其意涵應與水相關而與火相背，稱這類紋飾為圓渦紋或渦紋明顯較火紋合理。這一梳理也可反映出盤與早期盃關係密切，容庚將盃歸為水器頗有先見之明。²⁶

此外，1980年陝西城固龍頭火疖窖藏中出土的一件長頸提梁卣，外底中鑄一大幅陽線圓渦紋，²⁷ 此卣時代在二里崗晚期，說明圓渦紋不僅裝飾柱帽等處，也會裝飾於其他部位。

平谷劉家河商墓出土的另一件青銅盤，通高 205、口徑 380 公釐，寬斜沿外折，緊貼沿外邊相對立兩短柱，柱頭各伏臥一圓雕鳥（圖 6.1，簡稱劉家河盤二）。鳥頭大而頸細長，三角形短喙斜向下，身略豐滿。盤弧壁淺腹，內底面中央飾龜紋，腹內壁均佈三組魚紋（圖 6.2），外壁光素。盤下以高圈足相承，其上半均佈三個近乎長方形大透孔，下半平鋪斜角目紋帶，近底沿有略加厚的裙邊。²⁸ 盤中的鱉紋，絕大多數著錄稱龜，李先登明白指出為鼈，並與同出一鼎所飾龜鱉紋相聯繫，認為可能同具標示器主人族氏之功能，主人屬鱉族。李氏還認為此盤與李家嘴盤二相近，年代約在商代二里崗期，孟憲武有類似的看法。²⁹ 其實不然，下文會羅列多地飾鱉紋之盤，也分析它們的年代。殷璋璋和曹淑琴認為這件立鳥盤

23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收入氏著，《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355-395；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小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頁 233。

2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發掘報告》，頁 823-824，圖 554.4、圖版 231.3、彩版 38.2。

25 難波純子，〈商代銅盤內底上的世界〉，頁 659-667。

26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 472-474。

27 曹璋璋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卷一）（成都，巴蜀書社，2006），頁 69-71。

28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頁 1-8，圖 8、9；中國青銅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四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 175。

29 李先登，〈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發現的主要意義〉，頁 162-172。

在殷墟婦好墓和新幹大洋洲均有見，並據立鳥頭頂均未出現冠狀羽毛飾，推斷它們年代接近。其實它們大不相及，鳥的冠飾未必能作為年代判據。³⁰

鳥及立柱無分鑄痕跡，盤當渾鑄成形。圈足紋帶有與透空相應的鑄造披縫，其鑄型當由三等分範與腹芯、圈足芯組合而成。立柱外寬內窄，型腔在腹芯中做出，而在鳥頸前後的披縫說明在中間分型，其鑄型由腹芯和腹範在鳥的中間組合。

關於平谷劉家河商墓的年代和屬性，清理簡報根據出土器物類比，一方面認為其年代屬鄭州二里崗上層，並注明「即商代中期」，另外又說下限年代不會晚於殷墟文化一期。鄒衡認為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指出銅器中最晚的爵年代大體相當於殷墟第五段第 IX 組，絕對年代相當於武丁、祖庚、祖甲時期。張長壽認為青銅器年代為殷墟一期，而林沅認為多數青銅器屬二里崗向殷墟過渡的式樣，最晚的爵可以到大司空二期。朱鳳瀚認為該墓年代為殷墟一期，其中幾件青銅器年代到二里崗上層二期。³¹ 劉緒和趙福生分析京津地區商周遺址，認為劉家河墓年代屬殷墟一期，系圍坊三期文化。³²

楊育彬分析劉家河商墓青銅器，認為一批器物年代為二里崗上層時期，疊和兩件盤稍晚，接近於殷墟一期。其中圓鼎、鬲、罍、甗、甗、盃、甗造型及紋飾與中原無二，一些可能就是由中原傳來的。一對方鼎受中原影響較大，可能在當地鑄造。³³ 杜金鵬分析該墓葬出土青銅器，則認為是同一時期的製品，年代相當於殷墟一期偏早階段，與小屯 M232、M333 和 M388，及安陽三家莊 M3、靈寶東橋出土銅器相當，且適於比較。並具體分析盤與鄭州商城和盤龍城所出者的不同，指出與 M232 盤相同。出土銅器屬於「商式」，「幾乎看不出與安陽出土的同時期銅器有

30 蘇榮譽，〈技術傳統與藝術表現：論商代圓雕鳥鈕和鳥飾青銅器〉（上海：上海博物館跨越與超越——藝術史與博物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年8月6-7日），無頁碼，待刊。

31 鄒衡，〈關於夏商時期北方地區諸鄰境文化的初步研究〉，收入氏著，《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264；鄒衡，〈試論夏文化〉，收入氏著，《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116；張長壽，〈殷商時代的青銅容器〉，頁271-300；林沅，〈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收入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129-155；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1080。

32 劉緒、趙福生，〈圍坊三期文化的年代與劉家河 M1 的屬性〉，收入宿白主編，《蘇秉琦與當代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146-152。

33 楊育彬，〈平谷劉家河商代銅器墓的幾點思考〉，收入王宇信、秦剛、王雲峰主編，《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北京：社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197-199。

什麼顯著不同」，「儘管目前我們還無法準確判斷劉家河銅器是當地鑄造的，抑或是來自中原的現成製品」。³⁴ 杜氏的看法頗為允當。

1936 年的安陽殷墟發掘中，在小屯發掘出一批墓葬，若干中型墓很完整，出土遺物豐富。其中 M232 墓室 3.40×2.30–2.26 公尺，有槨有棺，有殉人殉狗，墓主似乎為墓地居首人物。隨葬青銅禮器在棺槨之間東側，另有兵器在西側和棺中。隨葬青銅容器計十件，包括觚、甗、爵各兩件，盤、鼎各一件。其中的青銅盤 R2073 在墓中正置，通高 110、口徑 328、足徑 173、壁厚 2-3 公釐，殘重 2515 公克。³⁵

盤 R2073 出土時器身和圈足有殘破，內壁有織物痕跡，銹蝕嚴重。斜折沿，方唇外出。腹較深，弧壁外飾三周突弦紋（圖 7.1-2），內壁一周均佈 6 尾陽線魚紋，逆時針同向排列。底近平，內底中央飾陰線龜紋，外底下接圈足，足壁略外斜，上段一周佈 3 個橫置的長方形透孔。李濟（1896-1979）曾將這件盤與殷墟出土的陶盤相比較，最接近 203D 白陶和 203E 灰陶，其中的小的差異，可能與質地有關。而石璋如（1902-2004）指出盤的紋飾重在內壁，所飾龜魚紋的佈局與城子崖一陶器裝飾一致，而青銅盤口蓋布是殷代的一種習慣。³⁶

萬家保曾系統地研究早年殷墟發掘青銅器的鑄造工藝，但對於這件盤，他只是強調外壁的三周突弦紋完整無打破痕跡，內壁浮雕魚紋系由腹芯對應陰紋成形。雖然對於此盤沒有進行具體鑄型復原，但卻對盤形器的鑄造工藝進行了討論。

盤的鑄型由三塊範、一塊腹芯和一圈足芯組成，三個澆口在圈足芯和範上各設一半，組合鑄型後構成完整的澆注系統，也就意味著鑄型倒立澆注（圖 7.3）。萬氏特別討論了圈足上的透孔，認為「惟由鑄造術著眼並非必須」，其是芯與範保持距離之方法，可以由墊片充任，西北崗 M1400 出土的盤 R11039 圈足並沒有透

34 杜金鵬，〈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與商代燕國〉，收入氏著，《夏商周考古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559-566。

35 石璋如，〈殷墟墓葬之三：南組墓葬附北組墓補遺〉（《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3），頁 1、13-17、30，圖版 15-16。

36 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國考古學報》第 3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頁 1-99，圖版 2.2，插圖 8b、8a；李濟、萬家保，〈殷墟出土伍拾參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圖版 7、53.2、頁 30、32、24-25，插圖 14；石璋如，〈殷墟墓葬之三：南組墓葬附北組墓補遺〉，頁 30、72。

孔就是反證。萬氏普遍考察了殷墟出土青銅器的圈足透孔，指出形成的一種方法是靠芯頭，泥芯伸出芯頭與範結合，保證了二者間距，並指出多數器物的分型面通過透孔。但他辨析到，爲此目的不必拘泥將芯頭做成一定的形狀，因此透孔的作用在於裝飾。他指出形成透孔的另一種方法是施用青銅墊片，澆注後墊片脫落形成孔洞，墊片部分熔合，銹蝕後逐步顯出孔洞，墊片完全熔合即無孔，這些現象都可在殷墟出土青銅觚中找到。³⁷ 但卻未明指，實則可疑。³⁸

關於小屯五座墓的年代，學術界討論很多，但基本上都認爲 M232 的年代屬早期，即殷墟一期。李朝遠研究小屯墓出土青銅器，認爲這件盤與白家莊 M2:3 形制相同，爲典型的商代中期器。³⁹ 對這件盤，岳洪彬按照殷墟四期劃分法，將之定爲一期，並指出其主體特徵與二里崗上層窖藏出土者相似。⁴⁰ 陳芳妹的研究明確指出小屯五座墓時代介於二里崗與殷墟之間，和現在的中商劃分吻合（詳下），但她對盤只有一句話，「小屯五座墓的水器以盤爲重，此傾向同見於二里崗及典型殷墟風格」，⁴¹ 語義含糊不清。實則小屯五座墓就出土一件青銅盤，談不上傾向，至於典型殷墟風格，也不明所指。大體反映了既往學界對青銅盤的普遍態度。

四、婦好青銅盤與武官村墓青銅盤

盤與其他青銅容器相比，一個顯著差別往往在於腹內和腹外均有紋飾。這一裝飾類型與盤口敞大、盤腹淺便於觀瞻相關，也與更早階段如陶寺文化墓葬出土陶盤內的彩繪紋樣有承繼關係。

37 李濟、萬家保，《殷墟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專刊一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頁 20-25、38。持透孔爲保證型腔尺寸的說法還有劉焜，〈圈足的鏤孔：試論商代青銅器的泥芯撐〉，《南方文物》，2014 年第 3 期，頁 110-116。

38 蘇榮譽，〈二十世紀對先秦青銅禮器鑄造技術的研究〉，收入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 387-445。

39 李朝遠，〈試論殷墟一期青銅器〉，收入李朝遠，《青銅學步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8-39。李氏分析 M232 出土青銅器，按年代分 A（觚、爵、尊、鼎、盤）、C（甗、觶、斝）兩組，其中的 B 組無器，一處說甗 R2057 似乎是殷墟一期偏晚，與二期的甗相距不遠，一處說接近於殷墟二期。是從兩端看待，實則殷墟分四期，每期數十，斷代可謂細密。

40 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115-115、138。

41 陳芳妹，〈小屯五座墓的青銅容器——從二里崗到典型殷墟風格的轉變〉，收入宋文薰等編，《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上）（臺北：正中書局，1991），頁 181-232。

殷墟是商朝最後的都城，從武丁遷小屯為大邑商，有長達兩百多年的都城史。以婦好墓為代表的殷墟早期青銅器，厚重大方，繁榮富麗，難以相信是在洹北鑄銅的基礎上自然發展起來，而應以將南方鑄銅作坊工匠遷入造成的突然躍升的解釋為合理。⁴²

1976年發掘的殷墟婦好墓，是首次發現的完整的殷王室墓，雖規模不大，但隨葬品宏富駭人。在兩百多件青銅禮器中，包括一件婦好盤 M5:777，該盤被認為系婦好自作器，時代和屬性確切，可作為殷墟早期高等級青銅盤的代表。盤通高 130、口徑 366、圈足徑 233、壁厚 2 公釐，重 5900 公克。敞口，窄沿，方唇，淺腹，腹外鳥紋帶等分三組，每組以脊稜為基準兩夔相對佈置。底微圓，下接高圈足。圈足壁直，上側有長方形透孔，但有的被封閉。圈足外壁外飾獸面紋帶，三組獸面紋均有脊稜，與腹部夔紋帶脊稜位置相應。腹內壁一周紋飾不夠清晰，一組似為鳥、魚和獸紋；盤底面飾盤龍一條，龍頭的左右分別鑄銘「婦好」，旁有夔紋和獸紋（圖 8）。⁴³

婦好盤內外可謂滿佈紋飾，但基本屬於平鋪類型，只有夔、獸和龍的眼珠與獸面的鼻稜凸起，介於羅越（Max Loehr, 1903-1988）的風格 III 與 IV 之間。⁴⁴ 安陽小屯還出土了一件與婦好盤相同風格盤 M18:14，墓葬年代屬於殷墟二期，推測墓主也是王室成員。⁴⁵ 所以，這兩件盤可以代表殷墟早期高等級青銅盤風格與技

42 蘇榮譽，〈婦好墓青銅器與南方影響——殷墟青銅藝術與技術的南方來源與技術選擇新探〉，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承真樓編，《商周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 1-68。

4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 92，圖版 61.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圖 23.1。中國青銅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 167。發掘報告和圖錄以為盤腹外飾夔紋帶，實應為鳥紋，有稱之為夔鳥紋。

44 羅越安陽青銅器五種類型是青銅器風格研究中影響最大的理論，本是一套裝飾分類和描述系統，但在具體的討論中往往放大到斷代功能。這套理論因其學生貝格立（Robert W. Bagley）教授的推崇和應用而風行。參見：Max Loehr, "The Bronze Style of the Anyang Period,"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vol. 7 (1953), pp. 42-53; Max Loehr,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68);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 Robert W. Bagley, Max Loehr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Style and Classification in History of Ar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2008). 然而，羅越理論的局限性也是明顯的，本文所討論的盤就有悖於其說。而誇大其理論的做法必然貽害青銅器研究，對此，筆者將另外為文討論。

4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小屯村北的兩座殷代墓〉，《考古學報》，1981 年第 4 期，頁 491-518，圖 9，圖版 13.1。

術。黃濬（1880-1952）著錄的一件舟盤，⁴⁶ 造型和紋飾與婦好墓盤相同。

婦好盤在設計時加厚了底部，將圈足芯的頂面減薄。腹外壁遺留的鑄造披縫明確，鑄型由三範、一塊腹芯和一塊圈足芯組成，由圈足底沿倒立澆注，⁴⁷ 與萬家保復原的盤鑄型一致（見圖 7.3）。需要指出的是，此盤圈足部的透孔有的未透，屬於圈足器透孔較為常見的現象，說明使之成形的圈足芯自帶的芯頭沒有接到範上，也成為圈足透孔的設置非為芯撐以保證型腔尺寸之一證。

婦好墓出土的另一件青銅盤 M5:853，通高 160、口徑 410、圈足徑 222、壁厚 4 公釐，重 6600 公克（圖 9.1）。⁴⁸ 敞口，寬折沿外出。腹壁外平鋪一周斜角雲紋帶，上、下以突弦紋鑲邊。圓底，底面飾一條蜷曲成團的蟠龍紋，龍頭左上側飾一站立獸，右側飾兩條魚紋（圖 9.2）。圈足壁微外斜，頂面均佈兩對透孔，但兩個已被鏽塞閉；下段平鋪三組獸面紋組成的紋帶，獸面有脊稜型鼻樑。

1984 年發掘的安陽武官村墓 M259，緊靠侯家莊王陵區，也是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屬中型，墓底 3.9×2.2 公尺，深 3 公尺，曾遭嚴重盜掘，清理出若干件青銅器和兩件陶器，其中一件青銅盤 M259:4 通高 194、口徑 463、圈足徑 222 公釐。⁴⁹ 盤寬沿外侈，口微斂，腹略深，外壁飾一周平鋪夔紋帶，其上、下以圓圈紋帶鑲邊；內壁一周均佈三條魚紋。底微圓，底面中間飾渦紋。圈足壁直微外斜，頂部一周均佈三個方形透孔，下面平鋪一周獸面紋帶（圖 10.1-2）。

此墓的發掘報告認為該盤的形制與婦好墓出土的銅盤相似，並據其他器物形式，認為墓葬年代屬於殷墟四期分法的第二期，墓主可能是掌握一定軍事指揮權的殷王室成員。

這三件盤的出土單元均被公認為殷墟早期的典型，所出土的三件盤應該反映了其時代特徵。婦好盤最為明確，為婦好自作器，窄斜沿厚方唇，視覺上質感厚重，器表近乎滿佈紋飾，底面中心的大盤龍和腹內壁的三組魚、鳥、夔龍紋佈滿

46 黃濬，《鄴中片羽第三集》（北京：琉璃廠通古齋，1942），卷下，頁 7。

47 華覺明等，〈婦好墓青銅器群鑄造技術的研究〉，收入《考古學集刊》第一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 267 表 6。

4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頁 92，圖 21，圖版 62.2。

4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 259、260 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7 年第 1 期，頁 99-117，圖 17.1、圖版 13.3；中國青銅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三卷，圖 170-171。

器內壁；但這些紋飾均屬平鋪類型，只有龍、獸眼珠及鼻稜浮凸；腹外紋飾以細密雲雷紋襯地，鳥和獸紋均勻細紋線，雖然也是三層，卻是平面形式，與同出的浮雕三層花器物，裝飾風格頗不相同。其原因可能在於器類，鑄工或者婦好認為盤的紋飾適宜平鋪型。

婦好墓盤 M5:853 與婦好盤 M5:777 有很多相同之處，如質感厚實，厚壁、厚方唇，但不同之處也很明顯。腹外壁紋帶的不同微不足道，但折沿且外出較多，則具有早期作風，盤底面的蟠龍紋盤卷兩周至於腹內壁，在側面的龍頭周圍填飾獸紋和魚紋，反映出鑄工求變，將必要的裝飾要素如蟠龍、魚和獸紋排佈成別出心裁的樣式。盤沒鑄銘文，似乎非婦好自作器，有些略早因素，可以推定是早於婦好盤的殷墟早期作品。

武官村盤 M259:4 與婦好墓所出土的兩件大不一樣，寬折沿，盤底面飾渦紋，腹內壁一周均勻平鋪三尾魚紋，腹壁外平鋪目紋帶，明顯是中商作風。說明殷墟早期墓葬隨葬中商器物，婦好墓也不例外，提梁卣即是更早且具有南方風格器。⁵⁰遺憾的是 M259 被盜，無法窺知其隨葬品全貌。

五、商前期青銅盤的初步斷代

近百年的考古發掘，建立起中國早期青銅時代的基本序列是：

核心遺址	二里頭	→	二里崗下層	→	二里崗上層	→	中商	→	晚商
都城	偃師		鄭州商城				?		殷墟
時期	二里頭文化		商早期				商中期		商晚期

考古學家對商代歷年的探索，大體確定早商為西元前 1600 至前 1500 年，中商為西元前 1400 至前 1250 年，晚商為西元前 1250 至前 1046 年。小屯作為王都，應始於武丁，是為晚商。而文獻記載的盤庚所遷之殷，可能是洹北商城。在這樣的框架下，安陽小屯中商遺存可分為與中商二期和三期相當的兩個階段。

50 蘇榮譽，〈技術傳統與藝術表現：論商代圓雕鳥鈕和鳥飾青銅器〉，待刊。

「中商二、三期時，小屯一帶曾是洹北商城週邊的一處重要聚落。」⁵¹ 而從隨葬品看，小屯 M232 和 M333 早於 M388 和 M331。小屯墓葬所出青銅器的細分有待研究，但就青銅器本身而言，風格、技術和藝術的穩定性遠大於其變化性。⁵²

以婦好墓為代表的晚商早期青銅器風格特徵突出，婦好盤代表了平面型紋飾類型，而小屯早期墓葬出土青銅器紋飾與之判然有別。有鑑於此，原先殷墟青銅器四期的劃分，第一期的絕大部分器物應劃入中商的洹北期，遂可借此將殷墟青銅器劃分為早、中、晚三期，大體對應於四期說中的二、三、四期。如此略粗線條的分期，應能體現青銅器的穩定性，也可使其變化性較為突出，易於把握，還能體現與陶器的不同。

在既往的青銅器研究中，青銅盤是被邊緣化的器類。如張長壽、鄭振香與陳志達、楊錫璋與楊寶成等討論殷墟青銅器分期，幾乎不涉及青銅盤。岳洪彬研究殷墟青銅禮器，雖包括青銅盤，但也只是言簡意賅的一句話或幾句話。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很大可能與盤數量少有關，也可能與其形式簡單有關。

朱鳳瀚討論青銅盤的類型，依據器腹部形態分型、參照口唇分亞型、兼顧耳和圈足分式，總共分 A（包括 Aa、Ab 兩亞型）、B、C 三型，Aa 和 B 各有三式。本文所討論諸盤，基本屬 Aa 型，朱氏所舉四例從二里崗上層一期到西周早期偏早，⁵³ 類型劃分的意義被削弱了。

林巴奈夫研究古代中國青銅器，將盤分為「鑿口高圈足型」和「標準型」兩類，例外的一類是帶流盤，顯然他的分類是基於形，而對盤內紋飾幾乎不予考慮。他的理論較為模糊，何為鑿口、怎樣才算高圈足，全出自自我感覺；從西周盤開始分析，在每個時段都可以劃分出上述類型，如此分類必將迷失其學術目標。⁵⁴ 鑒於他將二里崗階段劃在商中期，其類型與年代關聯甚弱，甚至不免衝突。

51 唐際根，〈商王朝考古學編年的建立〉，《中原文物》，2002 年第 6 期，頁 50-59；楊錫璋、高煒主編，《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88、253、294、276-278。二里頭文化年代範圍為西元前 1900- 前 1500 年（頁 81）。楊錫璋、徐廣德、高煒，〈盤庚遷殷地點蠡測〉，《中原文物》，2000 年第 1 期，頁 15-19。

52 蘇榮譽等，《中國上古金屬技術》（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頁 371-373。

53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 279-285。

54 林巴奈夫撰，廣瀨熏雄、近藤晴香譯，《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41-242 頁。參見「第一卷圖錄」，頁 357-369。

例如，對比盤龍城李家嘴墓的兩件盤，圈足的相對高度都甚於商城窖藏和白家莊盤，是否前兩件一定早於後者？早多長時間？而小屯盤的圈足與商城窖藏和白家莊盤一致，是否年代相同？可見林巳奈夫的分類與斷代基本無關，但他對難波純子的青銅盤斷代的影響則是顯而易見的。她既認為商城窖藏和白家莊盤晚於二里崗上層，又認為李家嘴兩盤圈足較高，年代較晚。當她實際分析商代幾件盤時，馬上意識到林巳奈夫方法不涉及紋飾的短絀。⁵⁵

商代早期的青銅盤，腹外壁或飾突弦紋，或者飾獸面紋帶，或者飾目紋帶，均是寬線形式，3組或6組紋飾組成一周紋帶，浮凸在器壁。圈足頂部一周均佈3個透孔，形狀不一，位置與紋飾單元具有對應性，應當是新石器時代透孔裝飾的延續，與青銅器鑄造基本無關。這一時期盤的鑄造工藝也相對簡單，3塊範與一塊腹芯和一圈足芯組成鑄型，但分型面有通過透孔與在透孔之間的分別，限於樣本較少，還難以說明這種分別的內涵，或者需要與其他圈足器進行對比研究予以探討。總之，早商時期的青銅盤，共性很多，但一致性並不高，表現出早期特徵。若從紋飾發展的角度，這4件盤可排隊如下：

李家嘴墓二 → 鄭州商城盤 → 李家嘴墓一 → 白家莊盤

這一序列應該大致反映了二里崗前後期之間到二里崗末期，即商早期中段到末段的變化。

商晚期青銅盤數量有所增加，雖非本文關注的重心，但需要殷墟早期的典型樣本展示該階段的基本面貌。毫無疑問，婦好墓出土的兩件青銅盤足可說明這一點：腹外紋飾的平面型三層花、內壁滿佈紋飾，團曲盤龍紋是其核心，魚紋和獸紋，或者再加鳥紋與之相配是基本格局，另有可能將銘文鑄在盤底面的盤龍紋頭側。

明確了早商與晚商早期青銅盤的裝飾，中商階段的青銅盤介乎其中，便有了辨識的參照框架。和早商盤相比，中商時期的青銅盤內壁出現裝飾以至成為裝飾重點，龜螭紋、圓渦紋和魚紋成為其基本裝飾元素，渦紋圓形，而螭性常息，其紋也為圓形或近於圓形，適於裝飾在盤底面；龜螭紋與圓渦紋之間有內在聯繫，難波純子也認為其意圖一致。⁵⁶魚紋細長，其最好的姿態為游水，不宜安排在盤底

55 難波純子，〈商代銅盤內底上的世界〉，頁 659-667。

56 難波純子，〈商代銅盤內底上的世界〉，頁 659-667。

而適於盤腹內壁。然而，統觀諸器，其紋飾內容呈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即腹內壁裝飾魚紋，數量或有差別，但均是陰線、同一方向的長條形；盤面中心飾龜紋。鑄造工藝與商早期一致。

在中商青銅盤中，底面紋飾有龜鱉紋與圓渦紋的區分，二者年代難以分別。但是若從延續性看，圓渦紋在後期盤中幾乎消失，而龜鱉紋延續，可以推測圓渦紋或許早於龜鱉紋。對比劉家河盤一和武官村墓盤，後者內底渦紋素淨，而前者有圓圈紋鑲邊，後者或者略早。於是，中商幾件青銅盤可以排隊如下：

武官村盤 → 劉家河盤一 → 小屯盤 → 劉家河盤二

這樣的序列大概可反映了中商早期到晚期的變化。

六、城固龍頭火疙瘩青銅盤

1980-1981年，農民在城固龍頭鎮上街南側被稱為火疙瘩的土包挖土，分別在東北角和南側先後發現兩批青銅器，計13種75件，兩次各出土了一件青銅盤。

第一次火疙瘩東北角出土的青銅盤（簡稱城固火一盤），通高120、口徑335、腹深78公釐，重1740公克。⁵⁷這件具有寬斜折沿，使口更敞；薄唇，淺腹，腹壁向外弧鼓，飾一周窄細陽線斜角雲紋帶；底微圓，底面飾細線渦紋，其周邊鑲圓圈紋環。底下圈足壁微外斜，頂面均佈3個橫置的長方形透孔，孔之下的器壁加厚（圖11.1）。

腹壁平鋪斜角雲紋帶，紋線寬窄有出入，但基本上屬於細線型；紋樣構圖不很嚴格，有可能在範上起稿刻紋，即前揭萬家保所謂範作紋，但在何種乾濕度的情景下實施，尚有待研究。而盤底渦紋紋線在圓圈內對稱佈局，規矩流暢（圖11.2），範應當是從模上翻制的。即使如此，模上刻紋也存在一個作圖、等分的問題；什麼樣的作圖工具，如何分割，均是研究青銅器造型、紋飾等未曾涉及的問題。圓渦紋外的一周圓圈紋，圓整度和排列略有出入，如何成形也還不清楚。

57 王壽芝，〈陝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年第6期，頁3-9，圖7-8；曹璋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卷二）（成都：巴蜀書社，2006），頁157-158。二者尺寸有出入，從後者。後者認為出自城固蘇村，與前者不同，從前者。另見趙叢蒼主編，《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3，尺寸也不同。

未見關於此盤鑄造工藝資訊披露。在曹瑋等發表的細部照片中，表現了口沿下的披縫，位置不與圈足孔相應，而在其左側。折沿下的披縫垂直於腹壁，在紋帶上隱約有披縫殘跡與之相應，但很模糊；而盤的光素部分則毫無披縫痕跡，說明披縫曾被仔細打磨；而紋飾部分，或者在合範時採取措施以彌合接縫。口沿下可見披縫的深度約半公釐左右，在當時工具條件下打磨光潔已不可能，而腹壁之所以打磨光潔，原因只能是披縫窄而淺；與盤沿下披縫的明顯反差，有可能是泥範乾燥中變形、組裝時優先保證腹壁所致。盤壁的一個補塊表面相當平整，應該是澆注後發現大氣孔或澆不足孔而採取的補綴措施，品質頗高。至於墊片的採用，則有待 X 光成像揭示。

曹瑋列這件盤的年代為商中期，雖然趙叢蒼沒有具體討論青銅盤，卻將之劃為城固—洋縣青銅器的第一段，明確指出相當於二里崗上層晚段的白家莊期。⁵⁸

這件盤底面紋飾與劉家河一盤一致，較之武官村盤，多了圓圈紋鑲邊。但此盤腹內壁無魚紋，未見得強調盤內裝飾，應是更早形態，尤其是腹外壁紋帶為細線類型，應該略早於寬線紋帶，年代合適排在中商的早期。

第二次在火疙瘡南側發現的窖藏中，也出土有一件青銅盤（簡稱城固火二盤，圖 12），其局部口沿殘缺，通高 150、口徑 309、腹深 102 公釐，殘重 2016 公克，藏陝西歷史博物館。此盤寬平沿，薄唇，腹較深，口微斂。腹壁外飾雙行圓圈紋帶，三條突弦紋分別穿過其中或作為上下邊欄。圓圈大小互有出入，排列不盡齊整，圓正度不一。底微圓，下接高圈足，其壁略外斜。圈足頂一周均佈三個形狀不規則透孔，一周突弦紋切過透孔下邊。⁵⁹

此盤器壁雖薄，但鑄造披縫仍被打磨，僅在紋帶上可見痕跡，位置與三透孔相應。據此可以推定該盤由三塊範和一塊腹芯、一塊圈足芯組成鑄型，且沿三透孔分型，披縫穿過透孔，許是造成透孔形狀不規則的一個原因。

對於這件盤，趙叢蒼將其劃為第一段，年代為二里崗上層晚段。曹瑋將其年

58 曹瑋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卷二），頁 157-158；曹瑋，〈漢中盆地商代早中期青銅器與盤龍城青銅器的對比研究〉，《江漢考古》，2021 年第 3 期，頁 52-57、107；趙叢蒼主編，《城洋青銅器》，頁 238、240。

59 王壽芝，〈陝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頁 3-9，圖版 1.3；曹瑋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卷二），頁 157-158。

代斷為中商，並為張婷和劉斌所採納。⁶⁰ 然而，這件盤腹內光素無飾，應屬於二里崗類型。盤龍城楊家灣墓葬出土的青銅罍 YWM11:34，肩部和腹部紋帶即是雙行圓圈紋，與該盤紋飾一致，且圈足的三個透孔形狀為不很規則的盾牌形，與該盤也有相近之處，二者年代應一致。楊家灣 M11 雖然年代被劃分為盤龍城第七期，屬於盤龍城最晚階段，但並不能排除其中隨葬早期青銅器。就其中的罍 YWM11:3 而言，紋飾為細線圓圈紋帶，與另一件尊 YWH6:15 相同，也被斷為第七期，或者不晚於被劃為第四期的尊 LZM2:75，⁶¹ 也許是二里崗上層早期的作品，這件盤或與之同時。

城固和洋縣的商代青銅器皆出自窖藏，⁶² 與鄭州商城及黃陂盤龍城所出土青銅盤對比，城固火二盤應當是二里崗時期的作品，結論與對城固龍頭出土雙耳簋的研究結果吻合；⁶³ 因其腹外壁的紋帶均是細線型，或許略早，豐富了早商青銅盤的內涵。而城固火一盤，則開啓了中商時期青銅盤的新型式：內壁裝飾紋樣。

七、晉陝高原諸青銅盤

晉陝高原往往有商代青銅器出土，面貌複雜、內涵豐富，年代和屬性不易判斷。本節將對其中的四件商前期青銅盤進行討論。其中一件出自河東的石樓，另三件出自河西的清澗，兩地隔黃河相望。

1959 年，山西石樓桃花者（莊）農民耕地發現青銅器，出自墓葬，考古清理時墓葬僅存腰坑殘跡，同時出土不少玉器、骨器和金器。其中包括一件青銅盤，

60 趙叢蒼主編，《城洋青銅器》，頁 238、240；曹璋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卷二），頁 157-158；曹璋，〈漢中盆地商代早中期青銅器與盤龍城青銅器的對比研究〉，頁 52-57、107；張婷、劉斌，《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盤卷》，頁 127。

6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頁 281、458-463，圖 210.1-3，圖版 91.3。

62 1998-2004 年，筆者曾數度造訪城固和洋縣，在苟寶平、周忠慶諸先生支持和協助下，與胡智生先生、艾素珊（Susan E. Erickson）教授研究該地青銅器，在求全思想指導下，由於器物分散，未能完成，包括上述兩件盤，頗為內疚。幸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提供了兩件盤的更多資訊，使本節得以完成。筆者將調整目標以嘗初願。

63 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構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收入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 352-386。

通高 196、口徑 471、腹深 135 公釐，重 7840 公克。此盤收藏在山西博物院（器號：60E1162，圖 13.1）。⁶⁴

盤具有斜折沿，薄方唇外出。腹頂一周均佈三個橫置的拱形鈕；腹部平鋪六組目紋組成的紋帶，上、下以圓圈紋帶鑲邊；內壁均佈三幅魚紋，均有長鬚。圓底面中央飾陰線圓渦紋，下接高圈足。圈足頂均佈三個不規則形透孔，下段平鋪三組獸面紋帶，獸面以脊棱為對稱展開，臣字形眼中眼珠微突，其餘器官不詳，但向兩側伸展的獸身向上、下均出鱗（圖 13.2）。

韓炳華不僅全面發表了該盤造型與紋飾的資訊和圖像，還對其鑄造工藝進行了研究，指出腹部和圈足紋帶均可見披縫，三條披縫設在紋飾組界，不通過透孔；圈足透孔的芯由圈足芯自帶，內壁可見三周排列整齊的墊片；還指出口沿下三鈕的成形，均以「開槽下芯」法渾鑄成形，使用了三枚芯。⁶⁵

對於石樓桃花者這群包括盤的青銅器的年代，鄒衡認為桃花者青銅器應分兩群，一群屬於第一期，年代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二期，絕對年代相當於武丁至祖甲時期，而包括盤的一群屬於第三期。⁶⁶ 張長壽以為它們晚於殷墟第一期或屬於第二期；⁶⁷ 鄭振香和陳志達、盧連成、韓炳華認為屬殷墟二期；⁶⁸ 戴應新以為約在殷墟二期；⁶⁹ 蔣剛和楊建華也認為屬殷墟早期。⁷⁰ 只有陶正剛將桃花者器群劃為晉西商

64 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青銅器〉，《文物》，1960 年第 7 期，頁 51-52、50；韓炳華，《晉西商代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 287-292；中國青銅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四卷，圖 175。三著錄尺寸互有出入，從韓炳華數據。按桃花者當系桃花莊之方言，為醒目計，用之。

65 韓炳華，《晉西商代青銅器》，頁 287-292、602、668。

66 鄒衡，〈關於夏商時期北方地區諸鄰境文化的初步研究〉，頁 275-276。前輩考古學家和文物專家對器物分組、分形式、分期幾乎不給出依據和判據，並且影響至後代學者。在此只能介紹觀點，難以討論。下同。

67 張長壽，〈殷商時代的青銅容器〉，頁 271-300。

68 鄭振香、陳志達，〈殷墟青銅器的分期與年代〉，頁 27-77；盧連成，〈先周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收入石興邦主編，《考古學研究：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頁 243-279；韓炳華，《晉西商代青銅器》，頁 668。

69 戴應新，〈陝北和晉西北黃河兩岸出土的殷商銅器及有關問題的探索〉，收入石興邦主編，《考古學研究：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頁 219-235。

70 蔣剛，〈南流黃河兩岸出土青銅器的年代與組合研究〉，收入楊建華、蔣剛主編，《西元前 2 千紀的晉陝高原與燕山南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72；蔣剛、楊建華，〈陝北、晉西北南流黃河兩岸出土青銅器遺存的組合研究〉，《文物世界》，2007 年第 1 期，頁 11-19。

代青銅器的晚段，年代在武乙至帝辛時期。⁷¹ 黃銘崇研究鄂爾多斯文化與商文明，將桃花者青銅禮器放在殷墟 II 期，並對比論證它們是在商文化地區製造，因貿易、戰爭或其他因素而進入北方草原遊牧者貴族的墓中。⁷²

對比前揭各盤，與此盤外形，內、外壁甚至外底紋飾最接近的是武官村盤，而且魚紋均有一對長鬚，些微的差別在於此盤魚紋的鰭上一下二，而武官村盤魚紋的鰭為上二下一；底面都僅飾渦紋；腹部紋帶相同，均以圓圈紋鑲邊。鑄造披縫均在紋飾組界，都不通過透孔，高度一致。這些都表明二盤似乎出自同一個鑄工之手，年代一致，應不晚於中商中期。明顯的差別在此盤口下的三個鈕，功能不明，頗為個別。

1964 年，農民在陝西清澗解家溝張家坵耕地時發現一批青銅器，包括尊、簋、觚、甗和盤各一件。盤通高 173、口徑 424、腹深 92 公釐，重 4885 公克，收藏於清澗縣文物管理所（圖 14.1）。⁷³

此盤具有寬折沿，薄唇外出較多。腹外壁平鋪變形目紋帶，細密雲雷紋襯地（《陝北出土青銅器》稱勾紋）；內壁均佈三條陰線魚紋；底微圓，底面中心飾一陰線龜紋（圖 14.2）。圈足較高，壁外斜並微曲，頂面一周均佈 3 個十字形透孔，中部平鋪一周與腹部相同的變形雲紋帶。腹部和圈足紋帶上有明顯鑄造披縫，並通過十字形透孔，盤的鑄型沿透孔三分。腹部和圈足紋帶相同，均是特殊的目紋，構圖和配置均罕見。而底面的龜紋作正在游水態也很稀見。龜四肢長伸，兩前肢均呈 L 形前伸，後肢曲回成倒「人」形準備後蹬，但卻沒有表現出爪及其蹼。

戴應新起初推斷這批青銅器的年代屬於商晚期，後進一步明確其相當於殷墟

71 陶正剛，〈山西出土的商代銅器〉，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198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57-64。陶氏說桃花者有兩件魚紋盤，誤記；即使包括三足盤，但其中並無魚紋。韓炳華即將之歸為盤。參見韓炳華，〈晉西商代青銅器〉，頁 293-295。

72 黃銘崇，〈遊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收入李永迪主編，〈「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23-98。本文的 J11 組，文章將包括石樓桃花者的晉陝高原諸地歸入遊牧區當有疑問。

73 戴應新，〈陝北清澗、米脂、佳縣出土古代銅器〉，《考古》，1980 年第 1 期，頁 95、70，圖 1，圖版 12.4；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第二冊（成都，巴蜀書社，2009），頁 234-237；第 1 冊，頁 28。二者尺寸和著錄略有出入，從後者。戴文稱器於 1962 年出自解家溝，綏德縣博物館稱這批青銅器於 1964 年出土於清澗張家坵（綏德縣文化館，〈陝西綏德發現和收藏的商代青銅器〉，收入《考古學集刊》第二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 41-43），為曹瑋所從。

二期，⁷⁴ 鄭振香和陳志達認為該盤不晚於殷墟二期。宋新潮認為年代在殷墟中期，盧連成、劉軍社、張天恩和黃銘崇認為相當於殷墟二期，曹瑋具體地將盤歸 B 型，分為陝北商代青銅器第二組，年代相當於殷墟第二期。⁷⁵ 朱鳳瀚認為大約相當於殷墟第二期第 II 段，⁷⁶ 蔣剛和楊建華也認為張家城群年代為殷墟早期。⁷⁷

這件盤造型具有早期盤的全部特徵，寬折沿，腹部和圈足平鋪紋帶，內壁飾三尾魚紋和龜紋，均陰線，年代應屬中商中期。

1977 年，農民在清澗解家溝發現一批 13 件青銅器，其中一件青銅盤，通高 184、口徑 429、腹深 99 公釐，重 5223 公克，收藏在綏德縣博物館（圖 15.1）。⁷⁸ 此盤具有寬斜沿，方唇甚薄，外出。腹壁外弧，上飾三周突弦紋，內壁均佈三條陰線魚紋；圓底，底面中央飾陰線龜紋（圖 15.2）；下接高圈足，圈足壁直外撇，頂部均佈三個形狀不規則的方形透孔，孔下飾一周突弦紋。

曹瑋的著錄給出了很多細節，對於認識該器的製作工藝作用很大。其一是腹壁有多處補鑄，而且集中分佈，一處集中三個補塊，大小不一，位於盤腹底弧彎處有一塊頗大的補塊。這些補塊凸起於腹壁約 1 公釐；補塊的中間都可見澆道殘留（圖 15.3），說明補鑄是從盤外壁澆注。從補塊集中看，補鑄是逐一進行而非一次澆注而補綴。有些補塊不僅在外壁凸起，有些在內壁也略有凸起，甚至在魚紋上也是如此；雖然較小，亦有礙觀瞻。個別補塊在內壁凸起約 1 公釐，且中間也有澆道殘跡（圖 15.4），說明是從盤內澆注的，可見此盤經過了多次補鑄，且補鑄

74 戴應新，〈陝北清澗、米脂、佳縣出土古代銅器〉，頁 95、70；戴應新，〈陝北和晉西北黃河兩岸出土的殷商銅器及有關問題的探索〉，頁 219-235。

75 鄭振香、陳志達，〈殷墟青銅器的分期與年代〉，頁 27-77；宋新潮，〈試論陝西出土的商代銅器〉，《文博》，1989 年第 3 期，頁 28-35；盧連成，〈先周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頁 243-279；劉軍社，〈陝晉蒙鄰境地區商代青銅器的分期、分區及相關問題的探討〉，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第 8 次年會論文集（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127-138；張天恩，〈晚商時期陝西地區考古學文化與殷墟商文化的關係〉，收入李永迪主編，《「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213-238；黃銘崇，〈遊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頁 23-98；曹瑋，〈陝北的商代青銅器研究〉，收入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第一冊（成都：巴蜀書社，2009），頁 14、28-30。

76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 1097。

77 蔣剛，〈南流黃河兩岸出土青銅器的年代與組合研究〉，頁 70；蔣剛、楊建華，〈陝北、晉西北南流黃河兩岸出土青銅器遺存的組合研究〉，頁 11-19。

78 綏德縣博物館，〈陝西綏德發現和收藏的商代青銅器〉，頁 41-44，圖版 10.13；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第二冊，頁 226-229。二者尺寸和著錄略有出入，從後者。

者非同系鑄工。

在圈足透孔上下並未見鑄造披縫，說明該盤在兩孔之間分型，鑄型和萬家保的復原相同（參見圖 7.3）。圈足內與盤底夾角中還殘留有些許泥芯。

鄭振香和陳志達指出，這組青銅器年代不一，其中的盤接近殷墟二期。⁷⁹ 宋新潮等均認可年代不一，以為盤與張家城盤相同，屬殷墟中期。戴應新以為只有同出的父父簋屬殷墟四期，餘均為殷墟二期。盧連成和劉軍社均認為相當於殷墟二期。曹瑋的研究將此盤列為 B 型，劃在陝北商代青銅器第二組，指出與小屯 M5:777 和 M18:14 相類似，年代相當於殷墟四期說的第二期。⁸⁰ 朱鳳瀚認為大約相當於殷墟第二期第 II 段，⁸¹ 黃銘崇以為同出的雙耳簋屬殷墟二期，餘為殷墟三期，即盤也屬三期。⁸² 蔣剛和楊建華認為出土此盤這組青銅器年代屬於晚商晚期。⁸³ 將此盤與婦好盤相對比，差異是十分明顯的，不能那麼晚。

此盤形近於盤龍城兩盤，但圈足和盤內有紋飾，明顯晚於它們。盤腹內飾三尾魚紋，均較劉家河二盤細長，形與武官村和桃花者盤的魚紋形相近，但無鬚，且兩側各兩鰭；盤底一隻龜紋作正在游水狀，較之劉家河二盤龜紋像生，沒有裝飾性的雲紋，年代應較之早，推定在中商中期。

1982 年，農民在清澗解家溝棗林坪發現一批青銅器，報導說出自一座墓葬，附近出有人骨。同出青銅器包括戈、戚、鏃、蛇首匕和盤各一件，箭鏃六枚，另有金耳飾 6 件。盤通高 197、口徑 496、腹深 101 公釐，重 9002 公克（圖 16.1）。⁸⁴

79 鄭振香、陳志達，〈殷墟青銅器的分期與年代〉，頁 27-77。

80 宋新潮，〈試論陝西出土的商代銅器〉，頁 28-35；戴應新，〈陝北和晉西北黃河兩岸出土的殷商銅器及有關問題的探索〉，頁 219-235；盧連成，〈先周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頁 243-279；劉軍社，〈陝晉蒙鄰境地區商代青銅器的分期、分區及相關問題的探討〉，頁 127-138；曹瑋，〈陝北的商代青銅器研究〉，頁 14、28-30。

81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 1097。

82 黃銘崇，〈遊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頁 23-98。本文的 Q11 組（頁 75），斷代一欄「雙耳簋屬殷墟 II 期其餘均屬殷墟第 II 期」，疑後者是「第 III 期」誤植。

83 蔣剛，〈南流黃河兩岸出土青銅器的年代與組合研究〉，頁 69；蔣剛、楊建華，〈陝北、晉西北南流黃河兩岸出土青銅器遺存的組合研究〉，頁 11-19。

84 高雪、王紀武，〈清澗縣又出土商代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3 年第 3 期，頁 110；高雪，〈陝西清澗縣又發現商代青銅器〉，《考古》，1984 年第 8 期，頁 760-761；曹瑋主編，《陝北青銅器》第二冊，頁 230-233。二者尺寸和著錄微有出入，從後者。後者記器出土於 1983 年。

其中的青銅盤寬斜沿，方唇外出；腹略深，外壁飾一周細線斜角雷紋帶，內壁均佈三條陰線魚紋。底近平，中心飾一陰線游水龜紋（圖 16.2）。高圈足，壁微弧，略侈，頂部均佈三個長方形透孔，中部飾一周夔紋，但較模糊，下有窄素帶。腹部紋帶上的鑄造披縫與三透孔位置相應，說明鑄型沿三透孔分型。

盧連成和劉軍社均將這組青銅器劃分為第三期，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三期；張天恩認為約當於殷墟文化第三期或略晚。⁸⁵ 而戴應新和黃銘崇認為相當於殷墟二期。⁸⁶ 的確，此盤造型別致，圈足高且直徑小，姿態挺拔但穩當有餘。斜折沿甚寬，是其早期特徵，但唇較厚，略有晚商傾向。腹外壁的斜角雲紋帶和劉家河盤二圈足紋帶一致，盤中心的龜紋作游水狀，無花邊，與解家溝盤相同。腹內壁的三尾魚紋屬瘦長型，上下各二鱗如同解家溝盤，但不及其寬肥；年代應與解家溝盤相同或略晚，在中商中晚期之交。鑄型結構也與張家城盤一致。

需要說明的是，清澗發現的三件青銅盤，均是高圈足且直徑較小的造型，寬折沿，腹部和圈足均平鋪紋帶，雖構圖不同，但風格高度一致，如同圈足頂的透孔，形狀不一。腹內壁都飾三條魚，雖構圖有出入，然格局相同。底面都飾陰線龜紋，姿態有別，應和其他差別一樣，當是鑄工避免單調的處理，和手工作品的互有差別在同樣的量級。

這裡所討論的 4 件晉陝高原青銅盤，雖然出土地點明確，而且都有豐富程度不同的伴出器物，但基本都不是科學發掘品，盤的出土背景與同出器物的關係較為模糊，針對具體器物的案例研究頗為罕見，準確的基於個案的深入研究的缺失，使得學術界對晉陝高原成批商代青銅器出土現象的關注，轉向概括性、概念化的討論，包括至為重要的器物年代和屬性這類關鍵問題。所幸《陝北出土青銅器》和《晉西商代青銅器》的編撰，提供了這些青銅器更多角度、更可靠的資料，使得本節的討論成爲可能。

難波純子按照林已奈夫的方法分析桃花者盤，指出形制與花紋都酷似武官村盤，認為前者從王都運來，而清澗的 3 件盤是獨自發展起來的，劉家河盤則屬於

85 盧連成，〈先周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頁 243-279；劉軍社，〈陝晉蒙鄰境地區商代青銅器的分期、分區及相關問題的探討〉，頁 127-138；張天恩，〈晚商時期陝西地區考古學文化與殷墟商文化的關係〉，頁 213-238。

86 戴應新，〈陝北和晉西北黃河兩岸出土的殷商銅器及有關問題的探索〉，頁 219-235；黃銘崇，〈遊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頁 23-98。

其後續形式。⁸⁷顯然沒有把握到它們總體面貌的一致性，也過於簡單地相信出自殷墟的青銅器就鑄造於本地，其實情遠要複雜。⁸⁸

歸結本節，本文認為晉陝高原商代青銅器中的四件青銅盤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細微的差異性，而且其年代基本上都在中商中期。這一點與筆者對石樓桃花者倒置獸面紋卣和洪洞上村鬲的研究結果相一致。那兩件青銅器工藝特徵明顯，可推定為中商南方鑄銅作坊的舶來品，⁸⁹這4件盤鑄自哪裡，尚無頭緒。期待更多深入的個案研究。

八、傳世諸早期青銅盤

出土地不明而流傳下來的青銅器，其著錄以呂大臨（約1046-1092）《考古圖》年代最早，其中沒有收錄青銅盤。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年在位）敕編的《宣和博古圖》（完成於宣和五年，即1123年），著錄若干件青銅盤，其中有兩件早期盤。

一件被稱為「周負龜洗」者（簡稱宣和負龜紋盤），按照宋太府尺314公釐、斤661公克、兩41.3公克計，⁹⁰通高188、腹深97、口徑440、圈足徑185公釐，重4,958公克。很明顯，此盤較高、腹較深，圖形似鉢。據圖（圖17），寬沿外出，腹部外弧，上飾三周突弦紋，內壁飾4尾魚紋，圖中僅露出龜紋的前半，錄文說「作一大龜負一小龜於上」。⁹¹底面紋飾十分怪異。底下高圈足，壁直外斜，頂部一周均佈3個近乎圓形透孔，中間似平鋪獸面紋帶，紋帶下有素面窄裙。

從錄文「洗中環以三魚」，按照紋飾對稱分佈慣例，知著錄明顯有誤，似乎描述者未親見器物、僅照圖直錄，因此，對龜紋的記錄當然值得懷疑，或者是誤將龜紋上圈紋認為小龜。至於錄文中將龜紋與河圖洛書、四靈聯繫起來，以說明

87 難波純子，〈商代銅盤內底上的世界〉，頁659-667。

88 蘇榮譽，〈婦好墓青銅器與南方影響——殷墟青銅藝術與技術的南方來源與技術選擇新探〉，頁1-68。

89 蘇榮譽，〈晉西兩件商代南方風格青銅器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年第11期，頁37-49。

90 丘光明、邱隆、楊平，《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391。

91（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清乾隆十八年天都黃晟亦政堂修補明萬曆二十八年萬化寶古堂刻本），卷21，頁19、20。

「尙象」，庶幾近乎虛言。當然，其鑄造工藝不可考。

另一件龜魚紋盤被稱為「周龜魚洗」，據錄文換算其通高 160、腹深 97、口徑 440、圈足徑 198 公釐，重 4627 公克。高度雖不及前器，依然是較高的盤。二者造型接近，尤其是盤底的龜紋及其出露情形（圖 18）。但此盤有幾處不同，其一是寬沿斜，其二是腹外紋帶為斜角雷紋，其三是腹內壁一周飾三尾魚紋，其四是圈足頂部為方形透孔，紋帶似乎並非獸面紋，但不能辨識。⁹²

端方（1861-1911）收藏一件龜魚盤，造型與此盤十分相似（圖 19）。以漢建初尺度量，以一尺 231 公釐計，⁹³ 通高 180、腹深 122、口徑 330、圈足徑 173 公釐，⁹⁴ 較《博古圖》盤高而口徑小，或許測量與尺度有差。對比兩圖，此盤魚頭向左，彼盤向右，餘則全同。因器不存，二者關係難以明白。至於盤口銘文，為陽線鑄銘，當屬偽作，然做法不明。

這三件盤均未見流傳後世，從紋飾看，似非偽器。後二者相同，腹外壁和圈足均平鋪紋帶，龜魚紋盤腹紋為斜角雷紋，與劉家河二盤圈足紋帶、棗林坪盤的腹部紋帶一致；腹內壁的魚紋也是長條形，在前揭中商盤中多見；而端方龜魚紋盤的魚身寬，口大張並翻唇，或較宣和龜魚紋盤為晚。至於宣和負龜紋盤，外壁飾三周突弦紋，和小屯盤、解家溝盤一致，所不同在於圈足飾有獸面紋帶。此盤腹內佈四尾魚紋，稀奇，魚也較寬，且也張口翻唇，與宣和龜魚紋盤相同，二者年代應一致。重要的是盤底的龜紋，雖只見前半，確作游水狀，但不似張家城盤龜紋的動作幅度之大，應屬於同樣理念的紋樣，出自同一工場的某一作坊亦可考慮。參照張家城盤年代，宣和負龜紋盤當鑄於中商中期，宣和龜魚紋盤也同時，端方盤應在中商晚期。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北京古董商黃濬著錄他經手青銅器，其中頗有幾件值得關注的青銅盤，遺憾的是圖錄只有器物照片、拓片和名稱，別無任何文字說明。因照片和拓片頗精緻，可透露出一些學術資訊。屬於商前期的青銅盤是兩件龜魚紋盤。

92（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卷 22，頁 21。

93 丘光明、邱隆、楊平，《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頁 198-201。

94（清）端方，《陶齋吉金錄》（清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卷 7，頁 47。

一件龜魚紋盤未注尺寸，據照片，此盤曾被京都中山松次郎收藏，通高 100、口徑 300 公釐。⁹⁵ 器形穩當，窄斜沿，方唇（圖 20，簡稱鄴中盤一）。腹外壁飾一周鳥紋帶，紋飾由細線構成，填以細密雲雷紋，紋帶浮凸於器表。腹內壁一周九尾順時針方向排列的魚紋，造型一致，微有出入。底面飾一龜紋，作灰身游水狀，為其他諸器所未見。圈足不高，壁微外斜，頂面有小透孔，下面似有紋飾，兩著錄均未涉及。此盤簡稱鳥紋龜魚紋盤。鄭振香和陳志達通過他們對殷墟青銅器的斷代，認為此盤屬於殷墟一期，⁹⁶ 即現在所說的中商晚期。

另一件龜魚紋盤也無尺寸。窄斜沿，較厚方唇（圖 21.1）。腹外壁飾三周突弦紋，腹內壁飾六尾魚紋，魚造型基本一致，僅細部互有出入，尖嘴歧尾鰭，前半身寬而尾窄。底面飾一龜紋，作游水狀（圖 21.2），紋飾與姿態與小屯盤的頗為相近，圈足相對較低，素面。⁹⁷ 此盤簡稱弦紋龜魚紋盤。

這兩件盤的造型高度一致，與小屯盤頗為接近。弦紋龜魚紋盤腹內壁飾一週六尾魚紋，少見，也與小屯盤相同，微小的出入在於小屯盤的魚紋為細長條形，上側出一組短平行線表示大鰭，弦紋龜魚紋盤魚紋分前後段。而鳥紋龜魚紋盤更進一步，腹內壁佈九尾魚紋，幾乎首尾相連成為紋帶，應較弦紋龜魚紋盤略晚，以小屯盤為基準，弦紋龜魚紋盤大約在中商中期，鳥紋龜魚紋盤在中商晚期。⁹⁸

劉體智（1879-1962）善齋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藏家之一，他曾收藏一件龜魚盤，以繪圖編著圖錄（圖 22.1）。此器收入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稱之為龜魚鳥紋盤（圖 22.2），對比可知繪圖走樣之甚。二者著錄尺寸不同，據容庚所錄、以建初尺計，盤通高 141、口徑 323 公釐。⁹⁹ 此盤圈足甚高，造型有若清澗張家瓜、解家溝等盤。寬斜沿，方唇。腹外飾三周突弦紋，腹內壁滿飾一周魚鳥紋，三魚三鳥相間順時針排列。鳥紋長尾粗腿，腦後飄翎，魚紋上下各兩鰭，象

95（民國）黃濬，《鄴中片羽初集》（北平：尊古齋，1935），卷上，頁 28；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 460，附圖 822；梅原末治，《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二）（大阪：株式會社中山商會，1960），No. 86。

96 鄭振香、陳志達，〈殷墟青銅器的分期與年代〉，頁 27-77。

97（民國）黃濬，《鄴中片羽第三集》（北京琉璃廠通古齋，1942），卷下，頁 9。

98 與此盤外形接近的一件盤收藏在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因內壁資訊不明，不便討論。著錄參見劉雨、汪濤，《流散歐美有銘青銅器集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No. 339。

99（民國）劉體智，《善齋吉金·禮器錄》（1934 年石印本），卷 8，頁 5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 460，附圖 826。

鼻形上吻後卷，嘴近乎獸，此一系列紋樣未曾見諸其他實例。底近平，底面飾一大龜紋，作游水狀（圖 22.3），形與清澗解家溝盤相同。底下皆高圈足，壁直而外斜，頂面有十字形透孔。鑄造工藝不可考。

容庚將此盤斷為商器。總體而言，這件盤具有中商時期盤的諸多特徵，外壁三周弦紋，足素面，裝飾聚焦在腹內壁，盤底龜紋已習見，但腹內壁出現了鳥紋，魚紋也出現了新的式樣，加之其較厚的唇，可推斷此盤大概是中商晚期器。

哈佛藝術博物館（Harvard Art Museums）的福格藝術博物館（Fogg Museum of Art）的一件青銅盤系 Charles B. Hoyt 的收藏（圖 23.1，簡稱 Hoyt 盤），通高 130、口徑 421 公釐。據陳夢家調查，此盤曾為端方著錄（圖 23.2）。¹⁰⁰ 寬平沿微斜，但口不盡平，亦不正圓，薄唇。腹壁外弧，外壁偏下位置平鋪一周斜角雷紋帶，盤內壁在近回折處均佈三尾魚紋。底微圓，底面飾一陰線游水龜紋；外接高圈足，其壁直，外斜。頂一周均佈三個長方形透孔，孔下方平鋪一周紋帶，由目雷紋填細密雷紋組成，紋帶下有素面帶。

腹部和圈足紋帶上存留鑄造披縫，垂直通過三透孔中間。腹外壁紋帶很窄，為斜角雷紋，與劉家河二盤圈足紋、棗林坪盤的腹紋一致，尤其與後者的造型、紋飾位置以及紋帶寬窄都接近，腹內部的龜紋和魚紋一致，二者如先後出自同一鑄工之手，年代在中商中期。些微的差別在該盤寬斜沿而棗林坪盤具寬斜折沿。

1980 年底，在北京安定門外小關收購站揀選到一件青銅盤，通高 155、口徑 417、腹深 100 公釐，重 3250 公克，有著錄將其年代斷在商中期，現收藏在首都博物館。¹⁰¹ 此盤口不很圓正，也不盡平（圖 24.1）。寬沿薄唇，弧鼓腹外壁平鋪一

100 梅原末治，《支那古銅精華彝器部》（大阪：株式會社山中商會，1933），No. 155。（清）端方，《陶齋吉金錄》，卷 3，頁 40。容庚著錄稱之龜魚紋盤，年代屬商（《商周彝器通考》，附圖 824）。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北京：金城出版社重排本，2016），A820。陳氏著錄器高 197、口徑 425 公釐。筆者未曾見過此盤，資訊來自陳夢家和梅原末治圖錄，照片（圖 23.1）和尺寸采自梅原，與陳氏著錄有出入，係不同人測量所緻。至於陳氏認為是端方著錄的「龜形盤」（圖 23.2），因圖繪失真，與照片有出入，亦可說明傳統綫圖著錄的局限。承匿名審稿者惠示，此盤 1945 年曾寄存波士頓美術館（BFA），網站有其尺寸數據。惜筆者僅知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簡稱 mfa），且 Hoyt 是該館藏品的重要來源，然未在網站查到此盤。存放之事雖不影響拙文討論內容，但將尋覓機會澄清。

101 程長新，〈北京發現商龜魚紋盤及春秋宋公差戈〉，《文物》，1981 年第 8 期，頁 54-55，圖 1-4；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編委會，《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銅器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No. 16。

周斜角雷紋帶，內壁一周均佈三尾陰線魚紋；底面中央飾龜紋（圖 24.2）。底下接高圈足，壁直而略外斜，頂部均佈三個方形透孔，下段平鋪變形目紋帶，裙窄。

此盤屬於典型中商中期盤，腹外壁斜角雷紋與棗林坪盤相同，圈足壁的變形目雷紋與張家瓜盤一致，而盤內的一龜三魚紋飾，在以上諸盤多見。鑄造披縫在腹和圈足紋帶上明顯，且通過透孔。至於圖錄說此盤屬北京地區少見的青銅藝術品，認為出自北京，則證據還不足。此盤的造型和紋飾，與前述 Hoyt 盤幾無二致，尺寸接近，鑄造工藝相同。可以認為是同一鑄工先後鑄造的，時代同在中商中期。

2014 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徵集到一件龜魚紋青銅盤，通高 162、口徑 430、圈足徑 195 公釐。國家博物館將其年代斷為商後期。¹⁰² 此盤口近直，寬斜折沿，方唇（圖 25.1）。腹壁向外弧，外壁平鋪一周細線斜角雷紋帶，內壁一周均佈三尾陰線長條形魚紋。平底，底面飾一陰線游水龜紋（圖 25.2）。下接高圈足，壁直而外斜，頂部均佈三個方形大透孔，下段平鋪變體目紋帶，底沿平整。

國家博物館著錄指出此盤與前述劉家河盤二、張家瓜、解家溝和棗林坪盤相近，參照朱鳳瀚對青銅器的年代劃分，認為魚紋和龜魚紋盤流行於殷墟文化第一、二期。明顯的事實是，該盤腹部和圈足紋飾與端方盤相同，早於前述殷墟小屯盤，而與武官村盤更近。前面已經討論過，武官村盤雖出自殷墟早期墓葬，但其年代明顯較早，因此，該盤的年代應在中商中期。

北京故宮博物院青銅器圖錄中收有一件稱作龜魚龍紋盤值得關注。該盤 1946 年入藏，通高 192、口徑 440、圈足徑 197 公釐，重 4780 公克。¹⁰³ 此盤敞口，淺腹，寬斜沿，薄方唇。弧形腹壁外平鋪陽線斜角雲紋帶，下腹收出微圓底，下接高圈足。圈足壁近乎斜直，略向外撇，直徑較小；頂部一周均佈三個不規則十字形透孔，中間平鋪陽線目紋帶，底沿較平。內底中央飾一陰線龜紋，並從底部均等地向口沿爬出三條龍，兩道陰線邊中飾一列陰線菱形紋，並在口沿上起管形龍頭，張口，口唇與盤唇近乎平齊，眼珠圓突，一對小角向上斜豎。龍的造型是平

102 呂章申主編，《近藏集萃：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入藏文物》（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頁 56-57；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青銅器卷·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 236-237。

103 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頁 102。

鋪的身軀接圓雕的龍頭。腹內壁在兩龍之間，各佈一陰線游水魚紋，順時針方向（圖 26）。著錄認為此盤年代為時代後期，實則應為商中期。

接下來討論據傳出自河南新鄭望京樓的一件青銅盤，因查不到其發現背景的资料，姑置於此。新鄭望京樓遺址位於鄭州商城和鄭韓故城之間，北距鄭州商城 25 公里，南到鄭韓故城 4 公里。經考古發掘，是一座二里頭文化至商早期文化的大型邑聚。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陸續有青銅器出土，但多未見諸著錄，僅有 1974 年出土的一批見諸報導。在新鄭望京樓東南發現一批青銅器，計爵、鬲、觚、鼎和罍各一件，另外伴出有 4 件玉器。金嶽將這組銅器與偃師二里頭和鄭州商城出土器進行對比，認為年代在二里崗下層。¹⁰⁴ 在發掘報告《新鄭望京樓》中，收錄了 3 件青銅罍、2 件爵，以及封頂盃、盤、壘、鼎、鬲、觚各一件，另有一件青銅鉞、一件青銅戈和 5 件玉器的彩色圖片，但卻無一字說明，尺寸自然無法得知。彩版六是一件青銅盤（圖 27）。¹⁰⁵

根據照片，這件青銅盤大敞口，寬折沿，薄唇；腹壁微外弧，外飾較寬紋帶由三組紋飾構成，似乎由相對頭的兩寬線夔紋成組；紋帶浮凸於器壁，夔的長圓形眼珠更為突出。盤底似微圓，下接高圈足。圈足上壁近直，均佈三個十字形透孔，位置與腹壁紋飾組的組界相應，兩周突弦紋串聯它們。圈足下沿有加厚的窄裙，底沿近乎平整。盤腹內壁光素，推測盤底亦如此。圖片中可見鑄造披縫在腹部紋飾組界，並通過圈足透孔，其餘地方均被打磨。這種分型形式與白家莊墓盤 C8M2:3 相同。

因這件盤的资料幾乎未發表，罕有學者關注它，唯見難波純子曾予討論。她判斷其年代和鄭州商城、黃陂盤龍城發現的盤都晚於二里崗上層。¹⁰⁶ 但從其造型看，寬折沿、高圈足外基本素面，盤內無紋飾，應該是屬於二里崗時期的作品。

最後討論范季融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件青銅盤。其通高 185、口徑 480、圈足底徑 250 公釐。¹⁰⁷ 盤敞口，寬折沿，折層很淺，薄方唇。腹壁外弧，中部平鋪 9

104 新鄭縣文化館，〈河南新鄭縣望京樓出土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81 年第 6 期，頁 556，圖版 4；金嶽，〈河南新鄭望京樓銅器斷代〉，《考古》，1983 年第 5 期，頁 468-470。

105 顧萬發主編，《新鄭望京樓：2010-2012 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彩版 4-15。彩照上印有二維碼，但卻無法連結。

106 難波純子，〈商代銅盤內底上的世界〉，頁 659-667。

107 范季融捐贈臺北故宮博物院盤的資訊承上海博物館周亞教授惠示並惠贈圖片，盤的基本資料

組變形目紋帶，兩側以圓圈紋鑲邊（圖 28.1）。腹壁內一周均佈三尾陰線魚紋，魚嘴大張而唇外翻，底微圓，中心飾一陰線圓渦紋（圖 28.2）。高圈足壁外斜，頂部一周均佈三個近乎方形的透孔，中間平鋪與腹部相同的紋帶，由三組紋飾構成，無圓圈紋鑲邊。盤特別之處在於沿下均佈三個貫耳，素面，一個其中尚殘存有泥芯。位置與透孔相錯數度（圖 28.3）。

銹蝕遮蔽了鑄造披縫，腹部紋飾分三組，組界設分型面，並通過圈足透孔，鑄型與其他盤相同。因考慮到三貫耳的「開槽下芯」成形，故而貫耳不在分型面上而相錯數度。

這件盤腹部和圈足紋帶，與張家城盤完全一致，腹內魚紋可知劉家河二盤和端方盤中，不夠清楚的魚頭，原來是魚口大張並外翻的形式。圓渦紋與桃花者盤相同，尤其是口沿下三貫耳與桃花者的三拱形鈕僅有寬窄之別，形制完全一樣，迄今所知僅此二例。因此，二者年代相同，屬於典型中商中期。

這組冠名為傳世品的青銅盤，有的見諸著錄，下落不明，有的可見器物流傳，但也可能易手。早期著錄所提供的資訊有限，圖片和照片品質與角度參差不齊，據之的討論難免欠周。先人的著錄，因可供參比的對象十分有限，可靠性往往堪虞，他們的結論難免寬泛和局限。而今，幸有出土地點可靠，特別是科學發掘的相近和相同器物，有一批反映了器物較多內涵且品質較高的圖片，可以對這些器物的年代和屬性進行較深入地討論，充分體現了考古科學對古器物研究的重要價值，反映了多角度觀察和研究青銅器的必要性。

九、結語：早期青銅盤的地位、排序與產地討論

中原青銅器無論造型、紋飾和製作工藝都不同於其他文明，即使是形狀簡單平常的盤也如此，而且中原及其周邊地區的青銅盤，風格與工藝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這種獨特的考古學文化、藝術和技術現象，值得研究，首先需要深入的案例分析。本文所分析的商前期青銅盤僅是一個嘗試，可作如下概括：

和圖片承故宮博物院吳曉筠博士惠供，十分感謝二位的襄助。張蒞博士新近發文討論此盤，文中盤的尺寸為：通高 150 公釐左右，口徑 300-400 公釐。感謝張博士惠賜大作。參見張蒞，〈古代生活中的潔淨與禮儀：從本院新入藏的商代晚期魚紋盤談起〉，《故宮文物月刊》，2022 年，第 475 期，頁 102-112。

(一) 僅隨葬大墓

前述出土青銅盤的墓葬均是各階段的大型墓，個別出自中型墓，小型墓不隨葬青銅盤。如山西靈石旌介的三座商代晚期墓 M1、M2 和 M3，隨葬青銅禮器分別為 23、18 和 17 件，但無青銅盤隨葬；安陽花園莊中型墓 M54，屬於殷墟二期，墓主為長族的高級貴族，隨葬青銅器 256 件，其中容器 43 件，無青銅盤；安陽戚家莊中型墓 M269，屬殷墟第三期，墓主可能是某一族氏的顯貴，隨葬青銅禮樂器二十三件、武器和工具等三十六件，亦無青銅盤隨葬。安陽郭家莊 M160 屬殷墟晚期，雖然墓葬規模較小，但隨葬青銅器多達 291 件、其中禮樂器四十四件，墓主被推測為址族的首領，是地位顯赫的貴族、較高級別的武將，故其中有一件青銅盤隨葬。¹⁰⁸

本文討論的六件早商青銅盤，望京樓盤信息缺失，城固火二和商城窖藏兩件出自窖藏，白家莊和李家嘴墓一均是殘墓，只有李家嘴墓二是完整的。這座墓出土青銅、陶、玉和木器等類 77 件，其中青銅器多達 50 件，包括容器 21 件（爵 5 件，罍 3 件，鼎 6 件，觚、尊、盃、鬲、甗、盤、簋各一件）、工具 4 件、餘為兵器。¹⁰⁹ 隨葬如此豐富青銅器的墓葬，在殷墟之前首屈一指，包括一件盤理所當然。反過來說，迄今所知二里崗期的青銅盤較少，與發現的這一時期大墓少有很大關係，尤其是作為都城的鄭州商城，大墓的稀缺使得商早期頂層級墓葬隨葬青銅器的資訊空缺，也就很難給予諸如李家嘴二號墓這樣的考古現象做出恰當的評價。

中商的青銅盤雖有 19 件（參見下文），出土地點明確的只有 9 件，其中棗林坪僅出土盤一件容器，另有一青銅匕和 6 隻金耳環，屬於墓葬的可能性極小，或者屬於窖藏。另外 8 件，除小屯 M232 完整外，其餘如劉家河墓、桃花者墓和武官村墓均被破壞或盜掘，所見皆是殘餘，至於張家疃、解家溝盤，連同器物的完整性都不無疑問，屬性自然不明。雖然如此，殘存青銅器亦頗可觀，羅列如下（參考文獻見前，此略）：

10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靈石旌介商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68-231；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戚家莊東商代墓地發掘報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頁 206-23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1992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 70-105、124-126。

10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頁 151-156，附表 3。

	鼎	方鼎	鬲	甗	簋	爵	斚	觚	卣	壺	觥	斝	尊	盃	盤		
小屯 M232	1					2	2	2				2				1	
劉家河	3	2	1	1		1	1		1			1	1		2	2	
桃花者	2			1	1	1	1	2	1	1	1	1				1	①
張家疁					1			1				1		1		1	
解家溝	2			1	2			2		2		1				1	②
火疙瘩二				1		1		1	1				2			1	
武官村	1			1												1	

① 另有三足盤 1、斗 1、匕 2。同出有金器。 ② 另有勺 1、匕 1。

很明顯，張家疁器群中無鼎、爵，與商代銅器組合出入太大，若非窖藏而出自墓葬，應有不少器物已散失。武官村墓被盜掘至基底，酒器只存一隻青銅罍，器物損失巨大無疑。小屯 M232 完整，隨葬青銅禮器 10 件，或者代表了中商晚期較高等級墓葬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劉家河墓，雖然已遭破壞，仍然出土了 16 件青銅禮器，尤其是兩件方鼎為其他考古單元所未有，而且同時隨葬兩件盤也十分特殊，墓葬內涵非同一般。

已知出土地點的商前期青銅盤，除鄭州商城、安陽殷墟兩都城之外（望京樓或者可歸入商城），自黃陂盤龍城而城固火疙瘩構成一條南邊線，自清澗張家疁—解家溝—棗林坪，經石樓桃花者而平谷劉家河，構成一條北邊線，盤均在南北線上，或許可以反映中商時代北邊的繁榮或商與北境往來的密切，也反映了商南進或者繼續向西南推進的力度。

（二）紋飾演變

盤腹外和圈足的裝飾，雖然可見從無到有、從簡到繁的發展過程，因早期樣本的缺乏，從無到有的變化還不能勾勒出來，從簡到繁的過程並不明顯。不可忽視的是，早商和中商都有若干外表素面或者僅僅裝飾突弦紋的青銅盤，是否原有彩繪類裝飾已不可考，但應是一個思考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屬於早商的鄭州商城和黃陂盤龍城，包括新鄭望京樓，青銅盤腹部都飾有寬線類型紋帶，雖僅 3 件，卻與二里岡上層絕大多數青銅器紋飾類型相一致，應該具有時代性；三盤的紋飾不同，一件連續目雲紋，一件獸面

紋，另一件爲夔紋，說明獸面紋在二里崗晚期還沒有取得普遍性地位，至少在青銅盤上是如此。城固火疙瘩出土的兩件盤，卻均飾細線紋帶，爲圓圈紋和斜角雲紋，單就紋線而言，或許年代略早。但城固火一盤內底飾渦紋，屬於中商早期，說明細線紋帶，一直延續到中商時期。而中商時期的青銅盤上，獸面紋似乎只偶然出現在圈足上，如桃花者盤，而腹外壁紋飾多樣，或者斜角雷紋、或者斜角雲紋、或者目雷紋，斜角雷紋較多。可能自商晚期開始，獸面紋或者還包括鳥紋裝飾在盤外壁才多起來。

與簡樸而多樣的盤外壁紋飾相比，盤內壁逐步成爲裝飾的重點，且不斷發展，終於在商晚期盤的內壁滿佈紋飾，效果如婦好盤。盤內壁初始的裝飾可能是圓渦紋，然後是龜紋，二者之間的聯繫比較清楚，或者意涵一致而具有遞接關係。與圓渦紋和龜紋相配的是魚紋，從3條到6條到9條，從分散的魚紋，其間有較大空間到幾乎排成一隊魚貫成紋帶，直到晚商早期鳥紋和獸紋的加入，再進一步即發展出婦好盤那樣的複雜形式。

對於商前期盤裝飾紋樣的分析，不難看出中商階段青銅盤與渦紋、龜紋和魚紋的關係緊密，在各類青銅器中，這是頗爲特殊的現象，是難得的器類與紋飾內容對應的實例，其中顯然包含了盤的水器功能和使用，水生動物與水器相配合，其內在關係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揭示。魚紋在仰紹文化半坡類型彩陶中頗爲流行，且有多種變體，¹¹⁰但在此後的龍山文化裝飾紋樣中，似乎不斷走向衰落，卻在商中期青銅盤上復興，關聯這一點，相信對認識彩陶時代裝飾藝術有所助益。至於林已奈夫將青銅器的裝飾幾乎都與神話和神像相聯繫，以晚期構造的傳說對應早期的紋飾，包括與本文關係密切的魚紋和龜鱉紋，過於寬泛空疏，不免有泛神話傾向。¹¹¹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無論盤外壁紋飾如何構成，盤腹外壁和圈足紋帶都是三組或三的倍數如六組或九組，與外壁三分組紋飾相一致，盤內壁的魚紋也三分，以至後來有鳥、獸的加入仍然大多如此，這一現象可能和盤的鑄型三分有關，

110 石興邦，〈仰紹文化彩陶紋飾辯證的發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收入氏著，《考古學研究：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頁219-235。

111 林已奈夫，《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殷周時代青銅器紋飾之研究》，頁154-156。參見「第一卷圖錄」，頁357-369

但何以如此，還缺乏研究。貝格立（Robert Bagley）研究商代青銅器也發現了這一點，認為中原青銅器之所以採用塊範法，與紋飾對應的分組相關。¹¹²然而，塊範法的工藝傳統在二里頭文化中已經肇建穩固，其時青銅器很少鑄造紋飾，貝氏的意見毋寧顛倒過來，商代鑄工充分利用了塊範法，設計了基於三的分組紋飾。此外，對於盤而言，腹內紋飾由腹芯所成形，與盤腹鑄型三分無關。看來，器物類型、範鑄工藝和鑄型與紋飾的關係值得深探。

還需注意到的是一個特例，即平谷劉家河出土的青銅盤二，沿上飾兩隻圓雕鳥，內壁和底面的紋飾是商代中期的「規範式」——「三尾魚紋和龜紋」，但鑄工似乎覺得這些裝飾還不夠，需要增加立體性的裝飾，便在口沿飾兩隻圓雕鳥，而鳥的形式和中商階段南方青銅器的圓雕鳥飾一致。但這件盤是鑄工偶爾為之，並沒有被固定並流行一時。然而，商晚期青銅盤中，口沿偶爾也出現圓雕鳥飾，對此將另外為文討論。¹¹³

不難發現，商前期青銅盤都沒有銘文，一方面與青銅銘文出現較晚有關，據石蝶的系統搜集，具有銘文的殷墟之前青銅器僅 19 件，盤無一見。¹¹⁴結合前面對盤與其裝飾紋樣存在固定關係看，商前期盤鑄銘的可能性極小。當然，早期銘文多為單字，其內涵究竟為何還不清楚。

（三）年代

本文討論了 27 件青銅盤，初略地按照年代分組如下：

早商二里崗期：

城固火二

李家嘴二、商城窖藏

李家嘴一、白家莊、望京樓

中商期

城固火一、武官村、劉家河盤一

112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 17-18.

113 蘇榮譽，《論圓雕鳥飾沿的青銅盤——兼論青銅裝飾因素的中斷與續接的鑄工因素》（北京：青銅器與文明交流—第三屆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論壇：中國國家博物館 110 周年專題學術論壇，2022 年 6 月 28-29 日）。將刊於《青銅器與金文》第十輯。

114 石蝶，〈商代中期有銘青銅器探討〉，《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4 期，頁 30-43。

小屯、解家溝、桃花者、臺北故宮、宣和負龜紋、鄴中龜魚紋二、善齋、張家城、棗林坪、宣和龜魚紋、陶齋龜魚紋、Hoyt、北京揀選、國博劉家河盤二、鄴中龜魚紋一、北京故宮

參照：晚商期

婦好墓盤

婦好盤

這裡建立的青銅盤演變序列，其框架依據的是考古出土的、伴出物明確的樣本所構建的界標。必須聲明的是，因為青銅器的流傳性和稀缺性，它們並不代表出土單元的年代，只能為之提供年代參考；但深究的話，對於理解那時甚至某人的喪葬會有所助益。

還需說明的是，對於某些窖藏和孤立的墓葬所出土的，特別是傳世的早期青銅盤，器物相同而品相有別，著錄的時代、條件不同，著錄者的見識與目的互異，詳略出入很大、圖像準確性不定、斷代與討論的內容互有差異，對他們提供的資訊，筆者不易辨識和把握，有些斷代意見僅供參考。

應無疑問的是，由風格分析所建立的序列，首先說明了因涇北商城的發掘而劃分出中商時期不僅合理，而且必要；其次對既往憑個人感覺或基於器物一點特徵而判斷青銅器年代的做法大可質疑。

(四) 產地問題

有關青銅器產地的說法很多，但多空泛，通常認為造型和紋飾略為特別的器物屬於本地鑄造，將晉陝高原很多青銅器歸為李家崖文化或者高紅類遺存就是明顯的實例。¹¹⁵ 至於戴應新指認龜魚紋盤是陝北商代鬼方的特色器和自作器，他地發現或收藏這類盤均鑄自那裡，¹¹⁶ 屬於愛屋及烏之論。

難波純子也是如此。她研究商代青銅盤，分王都製造器和地方出土器；並根據善齋盤（她稱 ST 盤）魚紋上的 8 形紋，稱其為地方製造器，進而據盤中的 3

115 李伯謙，〈從靈石旌介商墓的發現看晉陝高原青銅文化的歸屬〉，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 167-184；張天恩，〈晚商時期陝西地區考古學文化與殷墟商文化的關係〉，頁 213-238。

116 戴應新，〈陝北和晉西北黃河兩岸出土的殷商銅器及有關問題的探索〉，頁 219-235。

件匕推定它、以及清澗所出 3 盤，即張家瓜、解家溝和棗林坪盤為食器。¹¹⁷ 首先王都製造和地方出土是兩個完全不對等的概念，因為地方出土的很多就是王都製造的，最典型的實例，是羅豐發現草原文化的牌飾實則鑄造於王都；¹¹⁸ 而且，迄今除商代南方風格青銅器可以辨識外，尚不能確定王都之外何處可以鑄造青銅禮器。商周王國和諸侯國鑄銅作坊規模宏大，工匠眾多，不同工匠在紋飾上的變化往往可能是有意為之，其背景會十分複雜，既可能與擁有者的身份、等級、經濟、工限有關，也和工匠的求變意願有關，據一點紋飾的不同判斷地方製作遠遠不夠，至少需要證明。¹¹⁹ 至於用途的推斷，善齋盤是傳世品，根本不能確認匕與之成套，而且會有 3 件匕相配。若再推衍到清澗出土諸盤，同樣需要嚴肅論證。

對青銅技術和業已發現的鑄銅遺址的研究，揭示出鑄造商周青銅禮器是古代難度極大、操作鏈最長、工裝要求很高、技巧性高強的工業，適合大工場生產，而與鍛造加工適合家庭作坊有所區別。地方鑄造禮樂器，有無合格的、能勝任各環節的工匠，有無充分的工裝條件，都是關鍵因素，即使是物色到工匠、獲得了原料，準備了工裝，能生產怎樣的器物也是需要評估的。¹²⁰

本文所討論的 27 件商代青銅盤，初步認定 6 件屬於二里崗文化時期，2 件屬於晚商，其餘 19 件屬於中商階段。早商青銅盤雖然鑄造工藝較為定型，但裝飾紋樣較為分散，反映出作為新類型的盤的早期特徵。這些盤在何處鑄造？雖然鄭州商城發現了兩處鑄銅遺址，仍很邊緣，並非王室主要工場，¹²¹ 未必是盤的鑄地。盤龍城發現有鑄銅遺跡和少量遺物，內涵較初級，更不能說明青銅器鑄自該地。可見，商早期青銅器鑄地問題還遠沒有解決，作為都城的鄭州商城鑄造青銅器的水準和規模，都有待考古發現予以證實。

117 難波純子，〈商代銅盤內底上的世界〉，頁 659-667。貝格立即是此論的代表者。他認為存在都會 (metropolitan) 和地方 (province) 兩個系統，並認為南方風格青銅器屬於後者。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 29.

118 羅豐，〈中原製造——關於北方動物紋金屬牌飾〉，《文物》，2010 年第 3 期，頁 56-63、96。

119 蘇榮譽，〈老牛坡商代銅冶鑄遺物與銅器探究——一個冶金考古案例初析〉（北京：手工業考古·首師大論壇，2017 年 11 月 4-5 日），待刊；蘇榮譽，〈論三足鋸齒形鑄接青銅鼎——兼論聯襠鼎和侯馬鑄銅作坊生產諸題〉，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 52-187。

120 蘇榮譽，〈二里頭文化與中國早期青銅器生產的國家性初探——兼論泥範塊範法鑄造青銅器的有關問題〉，收入《夏商都邑與文化》（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 342-372；蘇榮譽，〈老牛坡商代銅冶鑄遺物與銅器探究——一個冶金考古案例初析〉，待刊。

121 蘇榮譽，〈鄭州商城鑄銅遺址與出土青銅器探究〉，《青銅器與金文》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 58-108。

對盤的技術分析可知，雖然器形和裝飾都較為簡單。19 件中商時代的青銅盤，除劉家河盤二有兩圓雕鳥裝飾外，各盤的紋飾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它們之間的共性遠大於各自的個性，有理由認為它們出自同一個鑄銅作坊。而各盤的個性，有時代方面的因素，也有不同鑄工的差異，甚至同一鑄工也會求變，先後鑄出有所差別的器物來。器物同源的背景是壟斷，結果會造成藝術的一致性和單調性，當然也會導致分佈空間的巨大化，以及與伴出青銅器年代的差異。貿然據某地出土有特徵青銅器或者據器物某一點特異而言地方鑄器的說法過於簡單化甚至屬臆測。

中商是亂世，時長若按前引一百五十年計，都城五遷，一處都城平均三十年。而離亂顯然是青銅工業的大忌，鑄銅能否在短暫的都城中進行不能沒有疑問。與此相反，的確存在著為數很多、分佈空間更大的中商青銅器。譬如本文所及的青銅盤何處鑄造，確是明顯的問題。考古報導的與之可關聯的鑄銅遺址規模甚小，產量可疑，還不能建立起對應關係。由對南方風格青銅器研究所指向的長江中游的一處大型鑄銅作坊，卻無絲毫的考古證據。¹²²毫無疑問，都城考古中的金屬手工業議題，尚有巨大的空缺。

附識：拙文寫作中承上海博物館周亞教授惠賜金石著錄資料，並為筆者這個金文盲釋讀金文，還提供給筆者多種資訊，筆者受惠他經年，亦師亦友。筆者多年來還不斷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牛世山教授請求考古資料，隨時請教商周考古問題，受他恩惠很多。筆者近些年之所以有較多研究發表，和諸多朋友的鼎力幫助密切相關。本文寫作中曾向首都博物館王顯國先生請求劉家河盤照片，得到慷慨回饋；承中研院史語所內田純子博士指點使用開放博物館資源，提供萬家保資料和她的研究文獻。此外，筆者還向武漢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孫卓先生核實盤龍城資料，向西北工業大學楊歡博士請求陝西考古資料，請上海博物館胡嘉麟博士核實范季融藏品，向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維鵬先生核實陶家營發掘材料，均得到熱心而快速的回應，在此一併志謝。

122 蘇榮譽，〈婦好墓青銅器與南方影響——殷墟青銅藝術與技術的南方來源與技術選擇新探〉，頁 1-68；蘇榮譽、宮希成，〈六安淝河青銅大口折肩尊的風格與工藝研究——兼及同類器物的時代與產地等問題〉，收入何弩主編，《李下蹊華：慶祝李伯謙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 359-421。

本文初稿曾呈請師友斧正，周亞先生提供了范季融先生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盤的資訊，隨即該院吳曉筠博士即寄來圖片供參考。武漢大學張昌平教授提示筆者內田博士曾研究青銅盤的資訊，湖南省博物館吳小燕副研究館員告知他們舉辦的「王者歸來」青銅器大展資訊，立即發現舊稿遺漏了新鄭望京樓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盤和國博徵集盤。對望京樓盤，經多方調研而不得準確結果，卻在校訂拙稿時，鄭州博物院湯威先生惠贈他搜集的望京樓青銅器資料供參考；對諸位的幫助，一併銘記於此。此外，筆者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嚴肅、認真、富有學識並對學術研究懷有摯愛和期許，指出了原稿的若干問題，避免了一些錯誤。至於更大的期許，有些在筆者計劃之中，來日將有新作呈現，有些可能要期待年輕的同道了。學術是接力賽，遠大的目標需要更多的接力者。不才雖將交棒，仍會繼續努力，回報諸位的厚意。此外，筆者感激季刊編輯的負責認真，三番五次核對校正，避免了諸多錯誤。當然，文稿中的問題概由筆者負責。

榮譽 壬寅年三月十四日一稿

十八日二稿

廿日穀雨繁體初稿

八月十日壬寅立秋後四日校改畢

立冬日丑時再校卯兔立春日校畢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清乾隆十八年天都黃晟亦政堂修補明萬曆二十八年萬化寶古堂刻本。
- (清)端方，《陶齋吉金錄》，清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
- (民國)黃濬，《鄴中片羽初集》，北平：尊古齋，1935。
- (民國)黃濬，《鄴中片羽第三集》，北京琉璃廠通古齋，1942。
- (民國)劉體智，《善齋吉金·禮器錄》，1934年石印本。

近代論著

- 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小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山西考古研究院等編，《於沃集：曲村——天馬遺址發現60周年暨晉侯墓地發掘30周年紀念文集》，太原：三晉出版社，2022。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靈石旌介商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259、260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7年第1期，頁99-117。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小屯村北的兩座殷代墓〉，《考古學報》，1981年第4期，頁491-518。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卷一—卷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998。
-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青銅器卷·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 王壽芝，〈陝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年第6期，頁3-9。
- 丘光明、邱隆、楊平，《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編委會，《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銅器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文物》，1977年第11期，頁1-8。
- 石璋如，《殷墟墓葬之三：南組墓葬附北組墓補遺》（《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3。

- 石興邦，〈仰韶文化彩陶紋飾辯證的發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收入氏著，《考古學研究：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頁 219-235。
- 安金槐，〈對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青銅容器分期問題的初步探討〉，《中原文物》，1992 年第 3 期，頁 7-36。
-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戚家莊東商代墓地發掘報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呂章申主編，《近藏集萃：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入藏文物》，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
- 宋新潮，〈試論陝西出土的商代銅器〉，《文博》，1989 年第 3 期，頁 28-35。
- 李先登，〈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發現的主要意義〉，收入《考古學研究》（六），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162-172。
- 李先登，〈平谷上古文化與華夏文明〉，收入王宇信等編，《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95-97。
- 李伯謙，〈從靈石旌介商墓的發現看晉陝高原青銅文化的歸屬〉，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 167-184。
- 李朝遠，〈試論殷墟一期青銅器〉，收入李朝遠，《青銅學步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8-39。
- 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國考古學報》第 3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頁 1-99。
- 李濟、萬家保，《殷墟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專刊一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頁 20-25、38。
- 杜金鵬，〈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與商代燕國〉，收入氏著，《夏商周考古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559-566。
- 孟憲武，〈平谷商代青銅器與中原青銅器對比研究〉，收入王宇信等編，《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227-232。
- 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林巳奈夫撰，廣瀨熏雄、近藤晴香譯，《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林沅，〈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收入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 129-155。
-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第 10 期，頁 24-42。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市博物館，〈鄭州新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文物》，1983年第3期，頁49-59。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鄭州商城的考古新發現與研究 1985-1992》，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 金嶽，〈河南新鄭望京樓銅器斷代〉，《考古》，1983年第5期，頁468-470。
- 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 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 胡家喜等，〈盤龍城遺址青銅器鑄造工藝探討〉，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附錄七，頁576-598。
- 唐際根，〈商王朝考古學編年的建立〉，《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頁50-59。
-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41。
- 殷璋璋、曹淑琴，〈平谷劉家河出土銅器墓及相關問題〉，收入王宇信等編，《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218-222。
- 郝欣、孫淑雲，〈盤龍城商代青銅器的檢驗與初步研究〉，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附錄一，頁517-538。
-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收入氏著，《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355-395。
- 高雪，〈陝西清澗縣又發現商代青銅器〉，《考古》，1984年第8期，頁760-761。
- 高雪、王紀武，〈清澗縣又出土商代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3期，頁110。
- 張天恩，〈晚商時期陝西地區考古學文化與殷墟商文化的關係〉，收入李永迪主編，《「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213-238。
- 張文軍、張玉石、方燕明，〈關於鄭州商城的考古學年代及若干問題〉，收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鄭州商城的考古新發現與研究 1985-1992》，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頁30-47。
- 張長壽，〈殷商時代的青銅容器〉，《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頁271-300。
- 張莅，〈古代生活中的潔淨與禮儀：從本院新入藏的商代晚期魚紋盤談起〉，《故宮文物月刊》，475期，2022年10月，頁102-112。

- 張婷、劉斌，《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盤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 曹瑋，〈陝北的商代青銅器研究〉，收入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第一冊，成都：巴蜀書社，2009，頁14、28-30。
- 曹瑋，〈漢中盆地商代早中期青銅器與盤龍城青銅器的對比研究〉，《江漢考古》，2021年第3期，頁52-57、107。
- 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第一冊，成都：巴蜀書社，2009。
- 曹瑋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卷一、卷二），成都：巴蜀書社，2006。
- 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陳旭，〈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銅器墓的年代〉，收入王宇信等編，《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214-217。
- 陳芳妹，〈小屯五座墓的青銅容器——從二里崗到典型殷墟風格的轉變〉，收入宋文薰等編，《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上），臺北：正中書局，1991，頁181-232。
- 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北京：金城出版社重排本，2016。
- 陶正剛，〈山西出土的商代銅器〉，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198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57-64。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程長新，〈北京發現商龜魚紋盤及春秋宋公差戈〉，《文物》，1981年第8期，頁54-55。
- 華覺明等，〈婦好墓青銅器群鑄造技術的研究〉，收入《考古學集刊》第一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244-272。
- 黃銘崇，〈遊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收入李永迪主編，《「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23-98。
- 新鄭縣文化館，〈河南新鄭縣望京樓出土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81年第6期，頁556。
- 袁進京、張先得，〈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1期，頁1-8、96-99。
- 楊育彬，〈平谷劉家河商代銅器墓的幾點思考〉，收入王宇信、秦剛、王雲峰主編，《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197-199。
- 楊育彬、曾曉敏，〈鄭州商城的考古學研究〉，收入楊育彬、孫廣清，《河南考古探索》，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頁232-291。
- 楊錫璋，〈殷墟青銅容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頁48-55。
- 楊錫璋、徐廣德、高煒，〈盤庚遷殷地點蠡測〉，《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頁15-19。

- 楊錫璋、高煒主編，《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楊錫璋、楊寶成，〈殷代青銅禮器的分期與組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79-102。
- 綏德縣博物館，〈陝西綏德發現和收藏的商代青銅器〉，收入《考古學集刊》第二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 41-44。
- 萬家保，〈安陽及黃陂兩商代遺址銅器紋飾之比較〉，《中國藝術史集刊》第七輯，1977，頁 1-23。
- 鄒衡，〈試論夏文化〉，收入氏著，《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 95-182。
- 鄒衡，〈關於夏商時期北方地區諸鄰境文化的初步研究〉，收入氏著，《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 253-293。
-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趙叢蒼主編，《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 劉雨、汪濤，《流散歐美有銘青銅器集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 劉軍社，〈陝晉蒙鄰境地區商代青銅器的分期、分區及相關問題的探討〉，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第 8 次年會論文集（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127-138。
- 劉煜，〈圈足的鏤孔：試論商代青銅器的泥芯撐〉，《南方文物》，2014 年第 3 期，頁 110-116。
- 劉緒、趙福生，〈圍坊三期文化的年代與劉家河 M1 的屬性〉，收入宿白主編，《蘇秉琦與當代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 146-152。
- 蔣剛，〈南流黃河兩岸出土青銅器的年代與組合研究〉，收入楊建華、蔣剛主編，《西元前 2 千紀的晉陝高原與燕山南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蔣剛、楊建華，〈陝北、晉西北南流黃河兩岸出土青銅器遺存的組合研究〉，《文物世界》，2007 年第 1 期，頁 11-19。
- 鄭振香、陳志達，〈殷墟青銅器的分期與年代〉，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7-77。
- 盧連成，〈先周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收入石興邦主編，《考古學研究：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頁 243-279。
- 戴應新，〈陝北和晉西北黃河兩岸出土的殷商銅器及有關問題的探索〉，收入石興邦主編，《考古學研究：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頁 219-235。
- 戴應新，〈陝北清澗、米脂、佳縣出土古代銅器〉，《考古》，1980 年第 1 期，頁 95、70、108。

- 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青銅器〉，《文物》，1960年第7期，頁51-52、50。
- 韓炳華，《晉西商代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 羅豐，〈中原製造——關於北方動物紋金屬牌飾〉，《文物》，2010年第3期，頁56-63、96。
- 難波純子，〈商代銅盤內底上的世界〉，收入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659-667。
- 蘇榮譽，〈二十世紀對先秦青銅禮器鑄造技術的研究〉，收入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387-445。
- 蘇榮譽，〈二里頭文化與中國早期青銅器生產的國家性初探——兼論泥范塊範法鑄造青銅器的有關問題〉，收入《夏商都邑與文化》（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342-372。
- 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構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收入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352-386。
- 蘇榮譽，〈老牛坡商代銅冶鑄遺物與銅器探究——一個冶金考古案例初析〉，北京：手工業考古·首師大論壇，2017年11月4-5日，無頁碼。
- 蘇榮譽，〈技術傳統與藝術表現：論商代圓雕鳥鈕和鳥飾青銅器〉，上海：上海博物館跨越與超越——藝術史與博物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年8月6-7日，無頁碼。
- 蘇榮譽，〈晉西兩件商代南方風格青銅器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年第11期，頁37-49。
- 蘇榮譽，〈晉南出土春秋中期前青銅盤探論〉，收入山西考古研究院等編，《於沃集：曲村——天馬遺址發現60周年暨晉侯墓地發掘30周年紀念文集》，太原：三晉出版社，2022，頁16-65。
- 蘇榮譽，〈婦好墓青銅器與南方影響——殷墟青銅藝術與技術的南方來源與技術選擇新探〉，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承真樓編，《商周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1-68。
- 蘇榮譽，〈論三足鋸齒形鑄接青銅鼎——兼論聯襠鼎和侯馬鑄銅作坊生產諸題〉，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52-187。
- 蘇榮譽，〈論圓雕鳥飾沿的青銅盤——兼論青銅裝飾因素的中斷與續接的鑄工因素〉，北京：青銅器與文明交流——第三屆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論壇：中國國家博物館110周年專題學術論壇，2022年6月28-29日。將刊於《青銅器與金文》第十輯，待刊。
- 蘇榮譽，〈鄭州商城鑄銅遺址與出土青銅器探究〉，《青銅器與金文》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58-108。

- 蘇榮譽、宮希成，〈六安淝河青銅大口折肩尊的風格與工藝研究——兼及同類器物的時代與產地等問題〉，收入何弩主編，《李下蹊華：慶祝李伯謙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 359-421。
- 蘇榮譽、張昌平，《黃陂盤龍城青銅容器工藝研究》，待刊。
- 蘇榮譽等，《中國上古金屬技術》，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
- 顧萬發主編，《新鄭望京樓：2010-2012 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 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綜覽》，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1986。
- 梅原末治，《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二），大阪：株式會社中山商會，1960。
- 梅原末治，《支那古銅精華彝器部》，大阪：株式會社山中商會，1933。
- Bagley, Robert W. *Max Loehr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Style and Classification in History of Ar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2008.
- Bagley, Robert W.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 C.: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
- Loehr, Max.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68.
- Loehr, Max. "The Bronze Style of the Anyang Period".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vol. 7 (1953), pp. 42-53.

圖版出處

- 圖 1.1 鄭州白家莊盤。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鄭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彩版 38.1。
- 圖 1.2 白家莊盤腹紋飾拓片。圖版取自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小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No. 707。
- 圖 2 鄭州窖藏盤線圖。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鄭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圖 554.1。
- 圖 3.1 黃陂盤龍城李家嘴盤 LZM2:1。郝勤建攝。
- 圖 3.2 李家嘴二號墓盤腹鑄造披縫。圖版取自蘇榮譽、張昌平，《黃陂盤龍城青銅容器工藝研究》，待刊。
- 圖 3.3 李家嘴二號墓盤 X 光片。圖版取自蘇榮譽、張昌平，《黃陂盤龍城青銅容器工藝研究》，待刊。
- 圖 4.1 黃陂盤龍城李家嘴盤 PLZM1:6。郝勤建攝。
- 圖 4.2 李家嘴一號墓盤鑄造披縫。圖版取自蘇榮譽、張昌平，《黃陂盤龍城青銅容器工藝研究》，待刊。
- 圖 4.3 李家嘴一號墓盤底部補塊。圖版取自蘇榮譽、張昌平，《黃陂盤龍城青銅容器工藝研究》，待刊。
- 圖 4.4 李家嘴一號墓盤外底補塊。圖版取自蘇榮譽、張昌平，《黃陂盤龍城青銅容器工藝研究》，待刊。
- 圖 4.5 李家嘴一號墓盤 X 光片。圖版取自蘇榮譽、張昌平，《黃陂盤龍城青銅容器工藝研究》，待刊。
- 圖 5.1 平谷劉家河墓盤一。王顯國惠供。
- 圖 5.2 劉家河墓盤一拓片。圖版取自袁進京、張先得，〈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 11 期，頁 5，圖 7。
- 圖 6.1 劉家河墓盤二。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四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 176。
- 圖 6.2 劉家河墓盤二腹內紋飾。王顯國惠供。
- 圖 7.1 小屯 M232 盤 R2073 線圖。圖版取自李濟、萬家保，《殷墟出土伍拾參件青銅容器研究》（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圖版 53.2。
- 圖 7.2 萬家保盤鑄型復原圖。圖版取自李濟、萬家保，《殷墟出土伍拾參件青銅容器研究》（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頁 32，插圖 16。

- 圖 8 婦好盤線圖。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3。
- 圖 9.1 小屯婦好墓盤 M5.853。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圖版 62.2。
- 圖 9.2 婦好墓盤內紋飾拓片。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圖 21。
- 圖 10.1 安陽武官村盤 M259.4。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 171。
- 圖 10.2 武官村盤內紋飾。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 170。
- 圖 11.1 城固龍頭火疙瘡盤一。圖版取自曹瑋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6，卷 2，頁 159。
- 圖 11.2 火疙瘡盤一底面紋飾。圖版取自曹瑋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6，卷 2，頁 161。
- 圖 12 城固龍頭火疙瘡盤二。圖版取自曹瑋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6，卷 2，頁 157。
- 圖 13.1 石樓桃花者盤。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四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 175。
- 圖 13.2 桃花者盤線圖。圖版取自韓炳華，《晉西商代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 288。
- 圖 14.1 清澗張家瓜盤。圖版取自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9，卷 2，頁 234。
- 圖 14.2 張家瓜盤內壁紋飾。圖版取自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9，卷 2，頁 237。
- 圖 15.1 清澗解家溝盤。圖版取自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9，卷 2，頁 226。
- 圖 15.2 解家溝盤內壁紋飾。圖版取自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9，卷 2，頁 229。
- 圖 15.3 解家溝盤外壁補塊。圖版取自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9，卷 2，頁 226。
- 圖 15.4 解家溝盤外壁補塊。筆者攝。
- 圖 16.1 棗林坪盤線圖。圖版取自曹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9，卷 2，頁 231。

- 圖 16.2 棗林坪盤內壁紋飾。圖版取自曹璋主編，《陝北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9，卷 2，頁 233。
- 圖 17 宣和博古圖負龜紋盤。圖版取自（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清乾隆十八年天都黃晟亦政堂修補明萬曆二十八年萬化寶古堂刻本，卷 21，頁 17-18。
- 圖 18 宣和博古圖龜魚紋盤。圖版取自（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清乾隆十八年天都黃晟亦政堂修補明萬曆二十八年萬化寶古堂刻本，卷 21，頁 21。
- 圖 19 龜紋盤。圖版取自（清）端方，《陶齋吉金錄》，清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卷 7，頁 46。
- 圖 20 龜魚盤。據梅原末治，《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大阪：株式會社中山商會，1960，冊 2，No. 86。
- 圖 21.1 龜魚紋盤。圖版取自（民國）黃濬，《鄴中片羽第三集》，北京琉璃廠通古齋，1942，卷下，頁 9。
- 圖 21.2 龜魚紋盤內壁紋飾。圖版取自（民國）黃濬，《鄴中片羽第三集》，北京琉璃廠通古齋，1942，卷下，頁 9。
- 圖 22.1 龜魚盤。圖版取自劉體智，《善齋吉金·禮器錄》（1934 年石印本），卷 9，頁 57。
- 圖 22.2 龜魚盤。圖版取自《商周彝器通考》，附圖 826。
- 圖 22.3 龜魚盤內壁紋飾。圖版取自劉體智，《善齋吉金·禮器錄》（1934 年石印本），卷 9，頁 58。
- 圖 23.1 Hoyt 盤。圖版取自梅原末治，《支那古銅精華彝器部》，大阪：株式會社山中商會，1933，No. 155。
- 圖 23.2 龜形盤。圖版取自（清）端方，《陶齋吉金錄》，清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卷 3，頁 40。
- 圖 24.1 北京揀選盤。圖版取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編委會，《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銅器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No. 16。
- 圖 24.2 北京揀選盤內壁龜魚紋。圖版取自呂章申主編，《近藏集萃：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入藏文物》，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頁 56。
- 圖 25.1 國家博物館徵集青銅盤。圖版取自呂章申主編，《近藏集萃：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入藏文物》，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頁 57。
- 圖 25.2 國博盤內壁紋飾。圖版取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編委會，《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銅器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No. 16。
- 圖 26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盤。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頁 76。
- 圖 27 新鄭望京樓盤。圖版取自顧萬發主編，《新鄭望京樓：2010-2012 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年，圖版 6。

圖 28.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盤。吳曉筠惠供。

圖 28.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盤內壁紋飾。周亞惠供。

圖 28.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盤外觀。吳曉筠惠供。

A Study on the Bronze *Pan* (Plate) Vessel from Early Shang*

Su, Rong-yu**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bronze *pan* has been a type of vessel neglected by scholars, especially the ones from early Shang period dated prior to Anyang. This is a study that consists of twenty-seven pieces of early Shang bronze *pan* vessels, some of which were excavated while others were handed down. Based on reliable unearthed samples, this study specifies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an* in its primary stage, namely the early Shang period. These pieces either have a plain body or are only decorated with string or band motif while the ring foot also either stays flat or only has a string motif. Successively, this study defines the features of *pan* from early Anyang, including having motif bands both on the exterior of the body as well as the ring foot; meanwhile, the interior of the vessel is also fully decorated. In addition, the motif maintains a plane with no high-relief patterns. Thus, it is settled that the growing luxuriance of motifs is the evolutionary tendency of Shang bronze *pan* vessels. Accordingly, twenty examples of *pan* belong to mid-Shang period, the main feature of which is the decoration on the interior of the vessel. The motif on the interior also suggests certain development, from the whirl to the whirl with fish, or turtle with fish. Aside from that, the fish also reflects a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three to six and being accompanied by birds.

The sequence that built by stylistic analysis manifests firstly the rationa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concept of mid-Shang period which arises with the excavation of Huanbei Shangcheng. Secondly, it challenges the method of estimating the date of bronzes by subjective instinct or being based on a certain trait. Thirdly, from a technical analysis, it is explicit that though the shape and decoration could be rather simple, the craftsmanship reflects minor differences. Such a conclusion even applies to *pan* vessels from the same period and provenance, implying that craftsmen would not want vessels to be identical.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theory of multiple bronze casting locations is an oversimplification or even a conjecture. Fourthly, the analysis of motifs reveal that certain vessel forms correspond to some specific motifs. The whirl and the turtle are interchangeable; therefore, the whirl has a certain connection with water and i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fire. In addition,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bronze studies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s.

Keywords: Shang bronze vessels, bronze *pan* vessels, early Shang, mid-Shang, late Shang, motif, casting technique, casting provenance

* Received: 18 April 2022; Accepted: 29 July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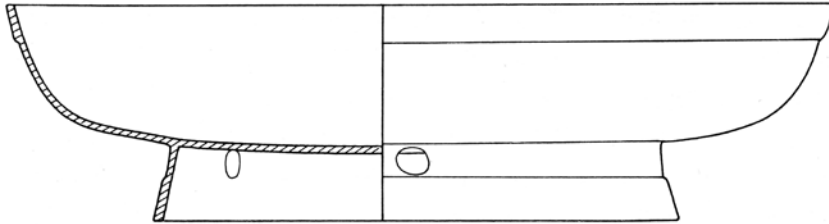
** Retir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圖 1.1 鄭州白家莊盤



圖 1.2 白家莊盤腹紋飾拓片



0 5公分

圖 2 鄭州窖藏盤線圖



圖 3.1 黃陂盤龍城李家嘴盤 LZM2:1



圖 3.2 李家嘴二號墓盤腹部紋飾



圖 3.3 李家嘴二號墓盤 X 光片



圖 4.1 黃陂盤龍城李家嘴盤 PLZM1:6



圖 4.2 李家嘴一號墓盤鑄造披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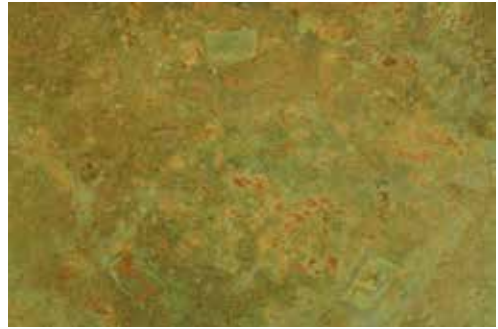


圖 4.3 李家嘴一號墓盤底部補塊



圖 4.4 李家嘴一號墓盤外底補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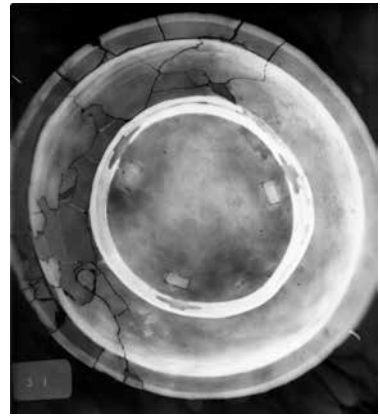


圖 4.5 李家嘴一號墓盤 X 光片



圖 5.1 平谷劉家河墓盤一



圖 5.2 劉家河墓盤一拓片



圖 6.1 劉家河墓盤二



圖 6.2 劉家河墓盤二腹內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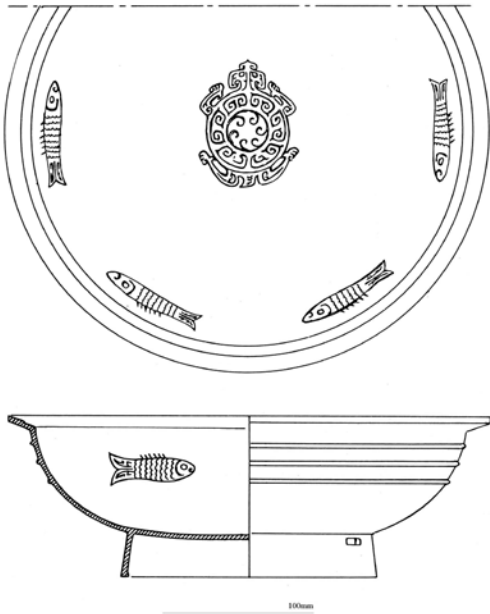


圖 7.1 小屯 M232 盤 R2073 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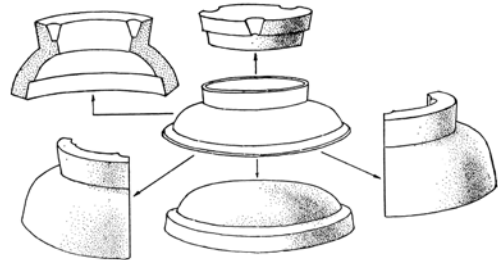


圖 7.2 萬家保盤鑄型復原圖



圖 9.1 小屯婦好墓盤 M5.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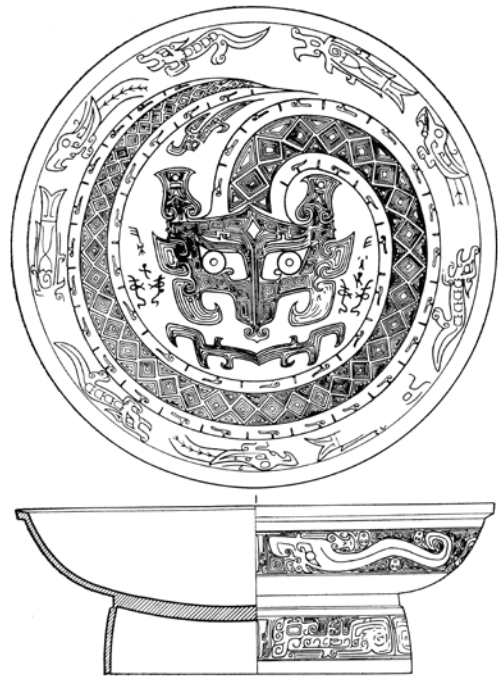


圖 8 婦好盤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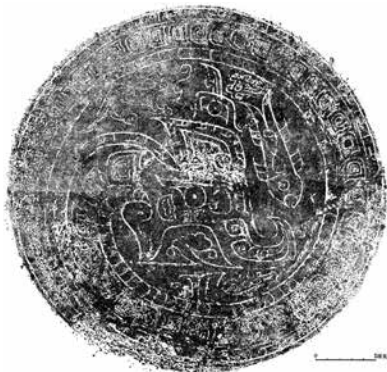


圖 9.2 婦好墓盤內紋飾拓片



圖 10.1 安陽武官村盤 M259.4



圖 10.2 武官村盤內紋飾



圖 11.1 城固龍頭火疙瘩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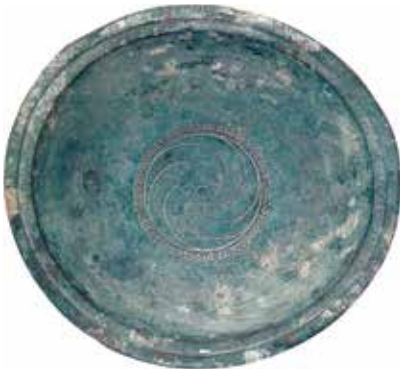


圖 11.2 火疙瘩盤一底面紋飾



圖 12 城固龍頭火疙瘩盤二



圖 13.1 石樓桃花者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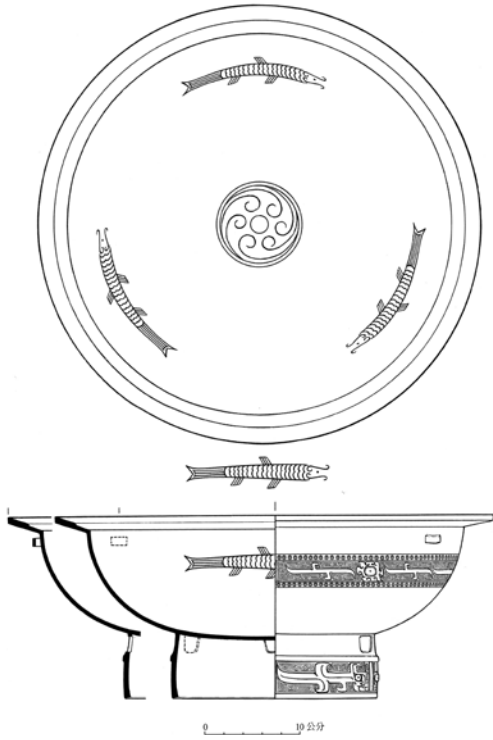


圖 13.2 桃花者盤線圖



圖 14.1 清澗張家瓜盤



圖 14.2 張家瓜盤內壁紋飾



圖 15.1 清澗解家溝盤



圖 15.2 解家溝盤內壁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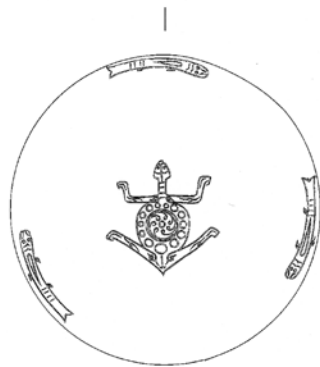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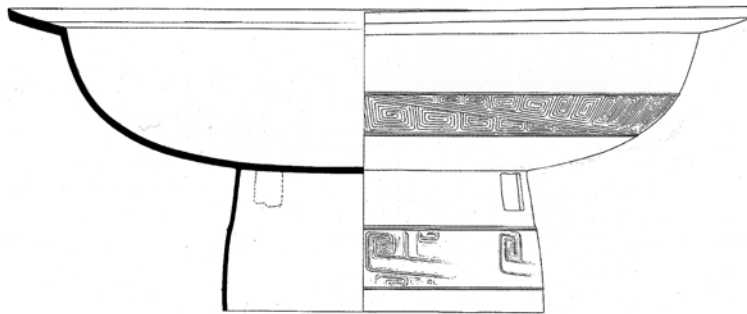
圖 15.3 解家溝盤外壁補塊



圖 15.4 解家溝盤外壁補塊



圖 16.2 棗林坪盤內壁紋飾



0 3.8cm

圖 16.1 棗林坪盤線圖



圖 17 宣和博古圖負龜紋盤



圖 20 龜魚盤



圖 18 宣和博古圖龜魚紋盤



圖 21.1 龜魚紋盤



圖 19 龜魚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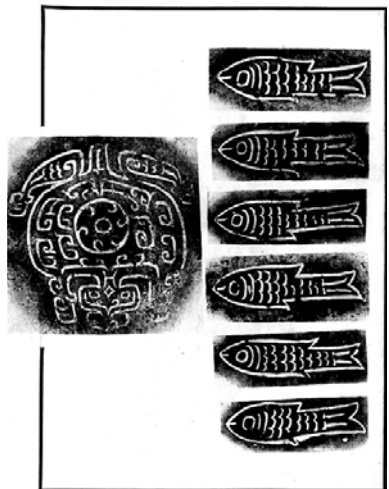


圖 21.2 龜魚紋盤內壁紋飾



圖 22.1 龜魚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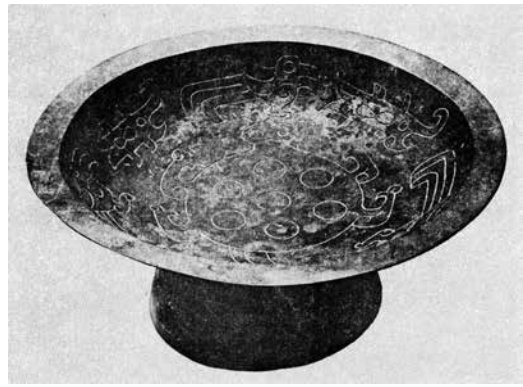


圖 22.2 龜魚盤



圖 22.3 龜魚盤內壁紋飾



圖 23.1 Hoyt 盤



圖 23.2 龜形盤



圖 24.1 北京揀選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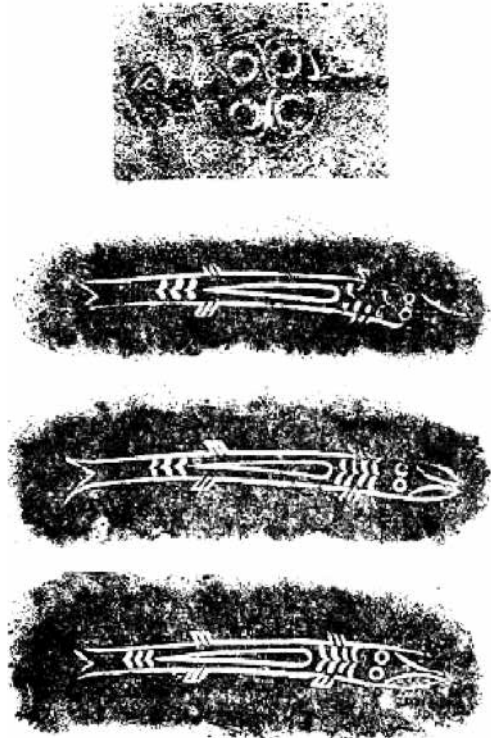


圖 24.2 北京揀選盤內壁龜魚紋



圖 25.1 國家博物館徵集青銅盤



圖 25.2 國博盤內壁紋飾



圖 26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盤



圖 27 新鄭望京樓盤



圖 28.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盤



圖 28.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盤內壁紋飾



圖 28.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盤外觀